

# 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 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 及其制度成因

汪宏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1990年代起，日本出現了一波民族主義的熱潮，學界有人以「新民族主義」稱之。這波新民族主義以「負面情緒」與「負面訴求」為特徵，凸顯出過去對日本民族主義理解的不足，值得進一步分析。本研究採取Brubaker所倡導的制度論觀點，主張不應把日本當成一個具有高度同質血緣與文化的民族國家，而應考察日本國族是由哪些制度所形塑；而由全球觀點的制度論取向出發，本研究分析日本戰後美軍占領時期(1945-1952)所留下的制度遺緒，進而探討日本當代民族主義背後的怨恨心態與制度成因。占領時期的盟軍總部在「公民—領土」制度方面，留下了一部充滿爭議的「和平憲法」，而在「族群—文化」制度方面，則透過思想檢查、言論管制與教育改革等措施，留下了後來被稱為「東京裁判史觀」的遺緒。這兩項制度遺緒在日本社會中埋下了怨恨的種子，使許多日本人無法擺脫「非正常國家」的陰影，且自認日本在許多事情上是個無法與其他國家比擬的「例外」；而美國在制度改革上的不徹底，更使得戰前的右翼與保守派思想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怨恨所累積的心理能量在戰後滋生蔓延。本研究檢視1990年代以來新民族主義論述中的負面情緒與負面訴求，發現其中採雜著反覆咀嚼的報復衝動與無能意識；而怨恨所導致的種種價值扭曲，使得民族主義者無法持平地看待事物與評價自我，歷史修正主義也應運而生。在分析的過程中，筆者也逐步揭示了一個或可稱為「重層怨恨」的情感結構，存在於東亞社會之間，值得進一步反省檢討。

關鍵詞：戰後日本、美軍占領時期、和平憲法、歷史修正主義、東亞  
怨恨心態的重層結構

台灣社會學第19期，頁147-202，2010年6月出版。

收稿：2009年8月5日；接受：2010年4月27日。

## From *On War* to the *New History Textbook*: *Ressentiment* and Its I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s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Nationalism

Hong-luen W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Since the 1990s, there has emerged a tide of nationalism in Japan referred to as new or “neo nationalism.” Characterized by resentful feelings and negative recourses such as historical revisionism, this tide of nationalism has exposed two shortcomings of previous understandings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that need further examination. Expanding on Rogers Brubaker’s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this study maintains that Japan should not be seen as a given nation-state constituted by highly homogeneous ethnicity and culture; rather, we should examine what kinds of institutions have constituted the Japanese nation since World War Two. In making this clai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resentment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nationalism by investigating institutional legacies left by the U.S. authorities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 from 1945 to 1952. The United States left the so-called “Peace Constitution” in civic-territorial institu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so-called “Tokyo Trial view of history” in ethno-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other. These two institutional legacies planted seeds of resentment in Japanese society that, accompanied by the incompleteness and inconsistency of the Occupation reform, eventually fostered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m in the postwar era. In light of Max Scheler’s theory of *Ressentiment*, this paper then analyzes the resentment behind the discourses made by contemporary nationalists. As resentment causes value-shifts and transvaluations, these nationalists can hardly judge things in fair terms; as a result, they tend to bear distorted views of history that eventually lead to historical revisionism. The analysis also unearths the structures of feeling that can be called “multi-layered *Ressentiment*”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that deserve further examination in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Postwar Japan, Allied Occupation Period, Peace Constitution, historical revisionism, multi-layered structures of Ressentiment in East Asia*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論語》子張篇

## 一、當代日本「新民族主義」概述

從 1990 年代開始，日本出現了一波民族主義的熱潮，學界有人以「新民族主義」（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 neo nationalism）稱之。<sup>1</sup>之所以稱其為「新」，主要是為了與戰前導致軍國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舊民族主義」有所區別。<sup>2</sup>這波新民族主義的熱潮主要展現在幾個議題上，包括首相的靖國參拜、環繞「憲法九條」與「正常國家化」的爭議，以及《國旗國歌法》的制訂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所謂「歷史修正主義」及其所引發的歷史教科書爭議。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時任東京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的藤岡信勝陸續發表文章，批評日本當前的歷史教育受到「東京裁判史觀」、「共產國際史觀」以及「馬列主義史觀」的束縛，呼籲發起「近現代史教育的改革運動」，倡導「自由主義史觀」以取代前述種種史觀。1995 年，藤岡成立了「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主張要把日本歷史教育從現有的「自虐史觀」、「反日史觀」、「暗黑史觀」解放出來，並出版了一系列《教科書沒教的歷史》叢書（藤岡信勝、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1996）。無獨有偶，1996 年 12 月底，電氣通信大學教授西尾幹二發表「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以下簡稱「創作會」）<sup>3</sup>創立聲明，並於 1997 年 1

1 參見小森陽一、高橋哲哉(1998)，東亞文史哲網絡(2001)，高橋哲哉(2005)。

2 日文的「超國家主義」容易對中文讀者產生誤導，此處的「超」指的是「超級國家主義」(ultra-nationalism)，而不是「超越國家主義」(trans-nationalism)。

3 「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的日文原名為「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簡稱「つくる会」，許多中文媒體或學界討論翻譯為「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或「撰寫會」，但筆者認為以「創作會」來翻譯較妥。「つくる」若以漢字表示可寫為「作る」、「造る」或「創る」，本身即有「創造」、「育成」乃至「無中生有」的意思，但並不包含「編撰」的意義在裡面。筆者認為，「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的名稱在字面上已經有很強烈的主張，亦即該會的企圖在於從新的史觀來改寫歷史、乃至「創造新的歷史（教科書）」，故譯成「創作會」較妥。事實上，西尾幹二等人為了合理化自己將日本《古事紀》裡的神話當作歷史，不止一次強調歷史其實不外是另一種故事

月正式成立「創作會」，由西尾幹二擔任會長，藤岡則擔任副會長，成員除了大學教授與學者之外，還包括了作家、媒體人與商業界的知名人物等。台灣讀者所不陌生的漫畫家小林善紀（小林よしのり）也名列發起人，並為《新歷史教科書》的執筆者之一。「創作會」不僅編寫《新歷史教科書》，同時還在全國各地組織分部，積極舉辦各項討論會與演講會，並發行機關刊物《史》，號稱擁有上萬會員，儼然成爲一時風尚，也讓許多人憂心日本的「草根民族主義」抬頭將使得政治右傾化（小熊英二、上野陽子 2003）。2001 年，由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通過日本文部科學省檢定，引發來自國內外的抗議聲浪。持反對立場的民間團體在日本全國各地發起「不採擇運動」，抵制《新歷史教科書》，最後《新歷史教科書》在全國只得到不及 0.1% 的採用率，可說以慘敗收場。然而，儘管《新歷史教科書》在學校的採用率極低，其「市販本」（即同樣內容的書籍不以教科書的形式發行上市、而是當成一般書籍在市面流通販賣）卻成爲暢銷書，據稱有 60 萬部以上的銷售成績。後來繼任「創作會」會長的田中英道對此頗感驕傲，因爲對於一本「非休閒讀物」、讀來並不輕鬆的教科書來說，這樣的銷售量實屬罕見（田中英道 2002: 34）。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市販本的《新歷史教科書》外，「創作會」成員的著作屢屢在市場上造成話題成爲暢銷書，如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1999），小林善紀的《戰爭論》（1998），以及前述的《教科書沒教的歷史》等，都是號稱有六、七十萬部以上銷售成績的暢銷書。從 1996 年到 2000 年，創作會的成員們出版了 100 冊以上的專書，大量占據了書店的平台，而單單是 1999 年，他們在全國各地舉辦以「歷史認識」或「教科書問題」爲題的演講會與座談會就達到 250 場以上（據推測實際數字爲此三倍）。<sup>4</sup> 這股風潮使得站在反對立場的左派學者與知

---

（「物語」），將歷史當成「創作」的意圖十分明顯。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多已指出民族的建構必然牽涉到「傳統的發明」與歷史的創造（Hobsbawm and Ranger 1983），「創作會」顯然是很有自覺地在「創作歷史」。

4 以上數據參見儀義文(2000: 296, 302)。這些統計數字隨著時間點而有變化，例如大日方純夫等(1999: 13)在 1999 年執筆批判《戰爭論》時，稱其發行量有 50 萬部，到儀義文

識人大感緊張，針對前述的每一本書或事件，幾乎都有數本批判的專論出現，對於歷史修正主義與保守民族主義者的種種言論逐一加以駁斥。我們僅僅從民族主義者的論述及其所衍生之批判的「量」來看，可說聲勢浩大，相當驚人。<sup>5</sup>

相較於日本國內沸沸揚揚、一波接一波的論戰，目前國內有關當代日本民族主義的學術研究顯得格外稀少。除了小林善紀(2000)的《台灣論》在台翻譯出版時曾經造成一股討論風潮外，對於日本當代民族主義進行系統性學術研究的並不多見。<sup>6</sup> 這樣的學術空白一方面似乎理所當然，一方面卻又令人驚訝。理所當然，是因為日本再怎麼說畢竟是「另一個國家」，別人的「家務事」，台灣人未必有置喙的餘地，而忙著藍綠惡鬥與統獨內耗的台灣社會也不見得有興趣去深入理解，彷彿事不關己。令人驚訝，則是因為處於帝國夾縫的台灣，對於過去曾經、未來也可能對形塑台灣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鄰近他者，累積的研究與瞭解似乎仍然相當有限。本文的企圖之一，乃是填補此一空缺。<sup>7</sup>

---

(2000)則稱有 63 萬部，而小林善紀到了《戰爭論》第 3 部(2003)出版時，則自誇前兩部合計已達 120 萬部的銷量。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看起來相當驚人的銷售成績，有些並不完全憑市場機制達成，而包括組織動員的因素。如前所述，「創作會」在日本全國各地設有分會，並且積極舉辦各種讀書會或討論會，這些著作經常是閱讀討論的對象，銷路也因此透過這些組織活動而大增。此外，《國民的歷史》為厚達七百餘頁的精裝書籍，卻以不成比例的廉價（低於日幣 2000 元）促銷，恐怕也是促成大量銷售的原因之一。

- 5 例如針對「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與《教科書沒教的歷史》，便有天野惠一(1997)，部落問題研究所(1997)等；針對小林善紀的《戰爭論》，可參見吉本隆明、田仲伸和(1999)，宮台真司等(1999)，大日方純夫等(1999)等著作；有關《新歷史教科書》，可參見小森陽一、高橋哲哉(1998)，小森陽一等(2001)，王智新等(2001)，小熊英二、上野陽子(2003)等。以上所舉的，還只是眾多討論的一部份而已，除了專書之外，更有無數評論散見各類報刊雜誌。
- 6 《台灣論》造成的風暴與相關討論，可參見陳光興、李朝津(2005)，前衛編輯部(2001)。這些討論多半以意識形態批判（或宣揚）為主，贊成者與反對者的立場鮮明，批判者中雖不乏頗有見地的折論，但主要集中在指出其中邏輯的謬誤、事實的歪曲、觀點的偏頗等，目的在於駁斥《台灣論》的論點與主張。
- 7 在台灣學界，黃自進(2004)是少數曾針對新歷史教科書做過較深入討論者。台灣的陳光興(2006)、中國大陸的孫歌(2002)等人雖然也碰觸了日本民族主義等議題，但基本上屬於思想評論的性質，儘管其中也摻雜了一些地緣政治與歷史文化的討論，但比較不是針對日本民族主義所進行的系統性研究。相較於台灣的空白，中國大陸對此無疑較為關注，也有幾本專論出現，例如張海鵬、步平(2002)，王向遠(2005)，步平、王希亮(2005)等。不過這些著作主要還是以意識形態批判、駁斥日本右翼言論為主要目的，有些著作中不乏「惡魔」之類的攻訐性字眼。

在這波新民族主義論辯中，筆者觀察到兩個特色，分別凸顯了兩個問題點，值得進一步探究。首先，過去有關日本民族主義的研究常特別提及「單一民族神話」與「天皇制」，且將之視為日本民族主義的特徵（小熊英二 1995，Doak 2007）。然而，在這波新民族主義論戰中，單一民族神話與天皇制卻很少成為論辯的焦點，頂多只是間接反映在有關「皇國史觀」或「靖國問題」的討論上。<sup>8</sup> 相反地，大部分的爭辯是環繞著「歷史認識」與「憲法改正」（正常化國家）的議題開展，而其中民族主義者的言論更是充滿了許多負面情緒（例如「受害者意識」以及對美、中、韓等國的嫌惡憤恨）與負面訴求（例如「否定現行歷史教科書」、「否定憲法」、「否認戰爭責任與戰時犯行」等），可說是這波新民族主義的特色之一。本文將在下面論證，這些負面情緒與負面訴求的背後，其實體現了一種尼采與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所稱的怨恨心態(*ressentiment*)，如果不對這些怨恨心態加以剖析，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那些被認為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想法，何以至今仍未散去，反而還能在一般庶民之間引起相當大的共鳴。事實上，在這波民族主義的論戰中，「怨恨」（日語直接以片假名寫成「ルサンティマン」）這個詞彙並不曾缺席，無論左派右派，都曾經借用這個詞彙來批評對方。例如宮台真司批評小林善紀，高橋哲哉批評加藤典洋，小林善紀批評仇日的韓國人，都不約而同用了「ルサンティマン」這個字。可惜的是，在這些文脈中，怨恨都只被當成一個帶有貶義的罵人字眼而不是分析概念，用意在於貶低對方抬高自己。因此，除了指出對方心懷怨恨、輕輕一語帶過之外，我們看不到對怨恨的進一步反省或分析。

本文對「怨恨」這個詞彙的使用與界定，與上述作者（以及一般用法）有所不同。怨恨在本文當中主要是被當成一個分析性、而非描

---

8 歸根究柢來說，無論「皇國史觀」或「靖國問題」，最後都無可避免要牽涉到對天皇的評價與定位問題。相對於「親美 vs. 反美」的扭曲（參見本文第二節第三小節的討論），日本左右兩派對天皇制的態度較為涇渭分明，左派陣營中也一直存在著明確要求天皇下台、反對天皇制的聲音。不過，在這波新民族主義的論辯中，除了少數例外，鮮少有直接針對天皇制或單一民族神話而發者。

述性或規範性的概念而使用。藉由舍勒的情感現象學取徑，本文將怨恨當成一個關涉到價值存有與主體行動意識的心理狀態來分析，它並不單純只是一種「憎惡」、「憤怒」或「仇恨」的情緒表現，而更牽涉到主體的存有意識、認知行動以及價值判斷。如果負面情緒與負面訴求的確是這波新民族主義的特點的話，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這些負面情緒背後反映的是什麼樣的主體意識與存有狀態？它的社會學成因與後果是什麼？它又牽連到什麼樣的認知行動與價值判斷？這些都值得進一步釐清，也是本文試圖要回答的問題。

這波新民族主義的另一個特色，則是反襯出過去對日本右派理解的不足。<sup>9</sup> 對於日本右派與軍國主義思想在戰後的復甦，一種常見的解釋是認為，由於美國在戰後對日本採取寬容政策，並未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甚且保留了天皇制，同時對右派保守勢力網開一面，容許部分戰前的中樞人物活躍在戰後的政治舞台，使得日本的戰前與戰後體制藕斷絲連，右派勢力也得以在戰後繼續保有生存空間乃至發展坐大，軍國主義思想也得以伺機復甦。<sup>10</sup> 這樣的說法固然有其事實根據，也的確說明了右派思想在戰後何以未被根除清淨，但對於理解新民族主義卻有其限制。如果我們把日本右派在戰後繼續發展坐大視為美國包庇、姑息乃至扶植的結果，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這波新

9 有關「右派」的用語，必須略作說明。許多人常把民族主義者直接等同於「右翼」，其實並不精確。嚴格來說，日語中的「右翼」指的是政治上極端的激進民族主義者，以「向陽社」、「玄洋社」、「黑龍會」、「大日本國粹會」等團體為代表，有更長的歷史傳統，與本文討論的「新民族主義」略有不同（雖然其中部分成員或支持者可能重複）（參見松本健一 1995）。嚴格定義下的「右翼團體」位於政治光譜的極端，相當於中文所稱的「極右派」，就絕對數量上來說並不是很多。然而，許多中文媒體報導乃至學術討論，經常把民族主義思想或政治立場右傾的保守勢力統稱為「右翼」，造成指涉上的混亂（參見步平、王希亮 2005: 5-14）。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左翼」這個名稱上。許多右翼或保守言論在論戰時，常把立場與自己相反的對手統稱為「左翼」，儘管嚴格意義下的「左翼」指的是少數一部份人所組成的團體（參見本文註腳 36）。為了避免與日語的指涉混淆，本文將盡可能使用「右派」、「左派」作為一般性的通稱，而「右翼」、「左翼」則循日語用法，指涉較為特定的少數團體。此外，如同下文所指出，日本戰後發展歷經了許多「扭曲」（ねじれ），所謂「左」、「右」派的區分亦不例外，這也是導致處理戰後日本的政治與思想格外不易的原因之一。本文第二節第三小節將對此略作討論，相關的進一步分析，則可參見吉見俊哉(2007)、加藤典洋(1997)。

10 這種觀點常見於中文學界或媒體評論，似乎已成為一種廣為流行的說法。

民族主義熱潮中，右派非但沒有對美國心存感激，反而一再攻訐美國所留下的制度遺緒（包含「東京裁判史觀」與「和平憲法」），並對美國充滿了敵意與怨恨。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也是本文嘗試解析的問題。

更確切地說，本文並非要針對日本民族主義作全面性的分析，而僅是嘗試從怨恨心態來分析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與特徵。當前有關日本民族主義的論辯中，經常可以觀察到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面，由於這波新民族主義的熱潮來得如此之快、反響之熱烈，引起很多有識之士的警覺，憂心日本的右翼勢力與軍國主義思想再度復甦，因此紛紛跳出來執筆批判，將其斥為邪說謬論，非除之而後快不可。另一方面，許多評論者在批判時有意無意流露出極為輕蔑的態度，認為這波民族主義熱潮中的一些要角（例如連「知識人」都談不上的「漫畫家小林善紀」者流），言論層次太低，充滿膚淺的謬誤，根本不值一駁。這種傾向其實並不只見於對日本民族主義的批判上，還包括其他研究民族主義的大家。例如 Ernest Gellner (1983: 124)、Eric Hobsbawm (1990: 12)等人均指出，民族主義充滿太多「虛假意識」與「錯得離譜」的信仰，禁不起嚴格的學術檢驗，因此也不值得分析。但筆者認為，這種認為民族主義「不值一駁」的輕蔑態度，恰恰是當前民族主義研究的一大盲點，也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大部分的學者不願把民族主義的理念認真當一回事看待，但這些信念卻又根深柢固地牢植於廣大的群眾（國民）當中，對於現實的運作有著深遠的影響。筆者並非要為民族主義的言論辯護，而是希望探究那些對某些人來說「錯得離譜、不值一駁」的「錯誤信仰」是如何產生，又為何能夠吸引廣大的信徒。對很多人來說，小林善紀與「創作會」的成員們提出了很多謬論歪理，必欲駁之而後快，但筆者認為，理解這些謬論歪理是怎麼產生的，也許比駁斥這些謬論歪理來得更重要。如果不對產生這些論述的歷程加以考察深究，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日本當代民族主義論述對當前的體制充滿如此深沈的怨恨與不滿。如果我們不瞭解為什麼當前的史觀被稱為「自虐史

觀」，就不容易理解為什麼會有「自由主義史觀」的產生。如果我們不瞭解為什麼當前的日本被認為是個例外的「非正常國家」，就無法理解為什麼許多人要提倡讓日本恢復成一個「正常國家」。

本文主張，日本敗戰之後，從 1945 年到 1952 年被美軍占領的這段期間，是理解戰後日本歷史發展的重大關鍵。如果不對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有進一步的理解，我們很難理解當代日本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為何呈現如今的樣貌。這波新民族主義的浪潮，同樣也必須從占領時期的歷史來加以考察。本文認為，在美軍占領期間，駐日本的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以下簡稱「盟軍總部」或 GHQ）<sup>11</sup> 爲了改造日本政體而採取的種種措施及其制度遺緒，在日本社會造成了許多扭曲：一方面，美國在制度改革上的不一致、不徹底（包括保留天皇制、與保守勢力合作等），造成戰前與戰後體制藕斷絲連；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國所留下的制度遺緒在日本社會埋下了怨恨的種子，使得戰前的軍國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等思想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怨恨所累積的心理能量而更加滋生蔓延，造就了 1990 年代以來的新民族主義風潮。<sup>12</sup>

在進一步討論前，有必要對本文的理論架構、方法與資料略作交代。在理論架構上，本文將採用「全球觀點的制度論」來解析怨恨的制度脈絡與社會學成因。這套理論架構主要承襲社會學中制度論的傳統，結合 John Meyer、Pierre Bourdieu、Rogers Brubaker 等人的理論，其長處在於能夠幫助我們將紛然雜陳的各種民族主義議題與爭辯做進一步的整理釐清，並強調制度在理解民族主義政治(nationalist politics)

11 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英文全稱為 General Headquarters,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簡寫為 GHQ/SCAP。日文當中經常直接使用「GHQ」作為簡稱。

12 事實上，日本民族主義中的怨恨心態其實並非始自戰後，也不完全是來自美軍占領。戰前日本軍國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興起，其實多少與日本和歐美列強競爭時產生的怨恨心態有關。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十九世紀末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日本在甲午戰爭打敗清廷後，根據馬關條約除了獲得台灣之外，同時也得到遼東半島。然而此一巨大利益引起列強覬覦，在俄、德、法三國干涉之下，日本被迫歸還遼東半島。西方列強對於日本這個亟欲加入「列強俱樂部」的東方新興強權多所排擠打壓，造成了日本在與歐美列強一爭長短時累積了不少屈辱與怨恨。不過這部分已經超過本文所要處理的範圍，此處暫不討論。

的重要性。此一理論架構將於第二節進一步闡明。在有關「怨恨」的分析方法上，本文採取的是德國社會學者兼思想家舍勒的現象學方法，以抽絲剝繭的方式，一步一步考察：這波新民族主義的論述，是否包含或反映了怨恨？在什麼意義下我們可以說他們心懷怨恨？這些怨恨從何而來？怨恨的具體內容與對象為何？怨恨所造成的後果又是什麼？這些都將在第三節中詳加闡釋。在資料的取材上，本文主要以「創作會」主要成員的言論與著作（包含小林善紀的《戰爭論》）作為分析對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言論一開始大多散見於日本各大主要雜誌論壇，後來才集結成書。<sup>13</sup> 即使小林善紀的《戰爭論》、《台灣論》等系列漫畫，一開始都是在《SAPIO》雜誌上連載，後來才以單行本形式發行出版。換句話說，雖然本文引用的僅有幾本專書或論文集，就數量或涵蓋面來看似乎為數不多，但讀者必須理解，這裡面為數甚多的文章當初都是在主要報章雜誌發表。此處所要強調的是，這波「新民族主義」的論戰延燒相當廣泛，除了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幾本造成話題的暢銷書外，日本極為發達的印刷媒體與種類繁多的報章雜誌，也是民族主義論述交鋒的主要戰場。在用語上，本文將盡可能使用「右派（新）民族主義者」來指稱這些人，籠統地來說，這同時含括了日語的「右翼」與「保守派」兩種民族主義立場。<sup>14</sup>

以下，筆者將先從制度論的觀點，分析美軍占領時期所留下的制度遺緒，如何在戰後日本社會埋下怨恨的種子。其次，則將援引德國思想家舍勒對怨恨的現象學分析，檢視美軍所留下的制度遺緒如何在戰後日本醞釀發酵，並分析新民族主義論述背後所反映的怨恨心態。結論部分，則將進一步反思民族主義當中的情感與價值觀，探討其背後衍生的「東亞怨恨的重層結構」問題。

---

13 例如本文大量引用的《新しい日本の歴史が始まる：「自虐史観」を超えて》一書，裡面所收錄的各篇文章其實一開始是刊登在《諸君！》、《正論》、《Voice》、《産経新聞》、《文藝春秋》、《サンデー毎日》等報章雜誌，涵蓋了主流媒體與主要的右派雜誌（參見該書「初出一覧」，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編 1997: 350）。

14 關於「右派」、「右翼」、「左派」、「左翼」等用詞，請參閱本文註腳9與註腳36。

## 二、日本戰後民族主義中怨恨的社會學條件：一個制度論的考察

Brubaker 在分析蘇聯解體與東歐民族主義的名著 *Nationalism Reframed* 中，曾提倡以制度論的分析取徑來研究民族主義，主張不應把國族當成具體而恆久實存的群體，而應視之為實作的範疇(a category of practice)、被制度化的文化與政治形式(an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orm)、以及偶發生成的事件(a contingent event or happening) (Brubaker 1996: 21)。這套制度論的觀點，對於研究日本民族主義，同樣具有高度的啓示性。日本經常自認——也常被認為——是個典型的「單一民族」國家，擁有完整的領土與高度同質的血緣、語言與歷史文化。然而，如果我們稍加考察日本的國族敘事建構過程，將會發現所謂高度同質的「單一民族」不過是個相當晚近才建立起來的神話，如果我們把日本當成「單一民族國家」的典型，或將之視為具有獨特血緣與歷史文化的群體來加以看待，不過是在複製著國族建構的神話。深研日本民族主義的社會學者小熊英二在《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大日本帝國的主流論述都還是主張日本乃多民族國家，天皇自古以來南征北討征服異族，擁有豐富的同化經驗，因此也能成功整合、同化被納入帝國版圖不久的台灣與朝鮮。然而，到了二次戰後，主流論述卻倏忽一變，主張日本自古以來即是個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且由於身處島國與世隔絕，日本民族與異族絕少接觸、保持著高度同質的血緣文化，歷史上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小熊英二指出，這個巨大的轉變反映了日本敗戰後的國內外情勢，包括象徵天皇制、國際地位的低落與自信喪失、厭倦戰爭渴望和平等傾向(1995: 362-364)。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制度論的分析更能夠發揮洞見。如果我們把日本視為給定的實體，是個由單一民族組成、具有高度同質的血緣、語言與文化的國家，那麼我們恰恰是掉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把應該被當成分析對象的「實作範疇」當

成了分析範疇本身。相反地，我們必須退一步問：究竟是哪些制度在界定、規範、組織「日本」這個國族的形式與範疇？日本國族的偶發性（而非本質性）是被哪些歷史事件所影響、甚或決定？誠如小熊英二所指出：戰前與戰後日本民族圖像，其實存在著巨大的對比與反差；我們必須追問：這個巨大的轉變是怎麼來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日本的敗戰、以及美軍在戰後所進行的對日改造與制度改革，是其中關鍵，而這也正是制度論的分析最能提供洞見之處。

制度論所稱的制度，指的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重複出現的社會模式與意義體系，包括正式組織、法律建制、文化規則等(Jepperson 1991)。汪宏倫(2001)根據 Brubaker 的啟發，結合 Bourdieu (1991)、Meyer et al. (1997)等學者的理論，發展出「全球觀點的制度論取向」作為民族主義的分析架構（參見表一）。根據此一架構，國族的制度可依民族國家的理念型區分為「公民—領土」與「族群—文化」兩個類型：「公民—領土」的制度（例如憲法、國防軍隊、公民身分與權利等）主要是界定個人、領土與政治組織之間的關係；「族群—文化」制度（例如教育體制所傳達的國家觀、世界觀），則是提供一套世界觀來界定人的身分歸屬與國族的存在意義。這兩種類型的制度，又必須同時從「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來分析，而不能僅僅單看

表一 「全球觀點的制度論」分析架構：Nation 的制度內涵與分析脈絡

	公民—領土制度 (政治/領土的地圖)	族群—文化制度 (文化/認知的地圖)
國際/全球脈絡層次	國家間體系 國際組織 國際法 跨國仲裁體系	國際間有關國族的文化語法 國際知識社群
國家/國內脈絡層次	主權、領土、公民權 表徵制度(國號、國旗、 國歌等) 外交 國防/軍隊 護照	「民族文化」 語言 文化遺產 「國家觀」與知識體系(史 地、文學等)

其中一個層次。<sup>15</sup>

汪宏倫(2001)利用這個架構分析台灣的國族政治，指出「公民—領土」與「族群—文化」兩套制度間的不一致、以及兩套制度分別在國際場域面臨的危機，是 1990 年代以後台灣國族政治升高的原因之一。從這個架構來分析日本民族主義的問題，同樣具有啓示性。如果國族是依靠制度而建構出來的形式與實作範疇，那麼日本當前的制度所建構出來的是一個怎樣的國族，而其與國際／全球脈絡的關連為何？表二將日本民族主義牽涉議題之場域與層次，做了一個大致的整理。這個表雖然沒有窮盡所有的相關事件與議題，但大致上幫助我們理解每一個議題在國族政治場域中的位置，以及彼此之間的關連。必須強調的是，這些議題位在不同的場域，各有各的論理與邏輯，不能相互化約，但它們彼此之間卻又高度交織牽連，以致於我們很難把其

表二 日本民族主義所牽涉議題的場域與層次

	公民—領土制度 (政治場域)	族群—文化制度 (文化／象徵場域)
國際／全球 脈絡層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原爆、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li> <li>• 美軍占領、東京審判與舊金山和約</li> <li>• 韓戰、美日安保條約與冷戰</li> <li>• 兩次波灣戰爭與自衛隊海外派遣問題</li> <li>• 國際間對日本戰時犯行（例如慰安婦、731 部隊等）的指控、訴訟與索賠</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近鄰諸國對歷史教科書的抗議</li> <li>• 國際知識社群關於南京大屠殺、慰安婦、731 部隊等議題的跨國調查與歷史研究</li> <li>• 原殖民地（台灣、朝鮮）要求將原台籍或朝鮮日本兵牌位從靖國神社移除</li> </ul>
國家／國內 脈絡層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國體與天皇制之論爭（含天皇之戰爭責任問題）</li> <li>• 和平主義憲法（「憲法九條」論爭）</li> <li>• 戰後美軍主導下所建立的議會民主體制</li> <li>• 對「謝罪外交」的指責</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國族的紀念／祭祀機構（如靖國神社，廣島、長崎等地的和平紀念館等）</li> <li>• 教科書問題（家永三郎訴訟案、「『東京裁判』史觀」、《新歷史教科書》、「近鄰諸國條項」等）</li> <li>• 節日與儀式（原爆紀念日、終戰紀念日等）</li> </ul>

15 關於此一分析架構的完整闡釋，可參見汪宏倫(2001)。

中一個問題與其他問題完全切割開來看。例如東京審判所根據的是國際強權之間法理與政治的邏輯，而歷史教科書背後所牽涉到的集體記憶、歷史書寫與國家觀／世界觀，依循的是文化與象徵場域的邏輯，兩者不可等同化約，必須獨立加以檢視；但另一方面，東京審判在法理、政治與道德效應上給日本國族帶來的衝擊，以及其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如何被闡釋、記述，卻直接形塑了日後有關歷史教科書的政治鬥爭。如果不釐清背後的關連，我們難以理解右派所謂「東京裁判史觀」的指控從何而來。<sup>16</sup>再如，日本戰後制訂所謂「和平憲法」，雖然屬於「公民—領土」制度場域，但由於和平憲法賦予國家相當特殊的地位角色，因此必須倚靠「族群—文化」制度場域的和平主義教育來加以合理化，而這就不得不牽涉到「國家觀／世界觀」的改寫，以及對日本戰前歷史的記憶與評價。因此，此一分析架構除了有助我們將環繞日本民族主義種種紛雜的議題加以整理分類外，同時有助於進一步釐清不同議題與場域間彼此交織牽連的關係。

藉由表二的圖示，我們可以重新勾勒日本近現代國族主義的發展軌跡與大致樣貌。首先，從國際與全球的脈絡來看，如同許多學者指出，十九世紀對東亞區域來說是一個地域秩序發生巨大變動的時期。原來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與朝貢體制逐漸解體，取而代之的是伴隨西方列強所帶來的主權國家體制。然而，這套源自西發利亞條約所建立的主權國家體制並不是一個萬邦平等的體制，而其導入東亞地區的過程更是伴隨著帝國—資本主義的擴張。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迅速崛起，不但要脫亞入歐、與列強並駕齊驅，而且透過與列強同盟，在東亞擴張版圖，企圖成為新的中心，建立新的區域體制。這樣的企圖最終導致了中日全面戰爭，並引發與英美列強的衝突，最後日本以敗戰收場，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亞地區的秩序在戰後因冷戰結構而改變，美國成為新的幕後霸主。這個結構一直等到 1990 年

---

16 中文所稱的「東京審判」，在日文裡稱為「東京裁判」。本文依行文脈絡，「東京審判」與「東京裁判」二詞交替使用。

代冷戰解體後才開始鬆動，而日本的新民族主義熱潮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sup>17</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敗戰，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斷裂。這個斷裂不但讓戰前與戰後的日本變成互不可理解的兩個世界，同時斷裂所留下的制度遺緒，直到今天還持續困擾著日本社會，成為民族主義爭辯的議題。我們有必要理解這個斷裂如何產生，以及它所留下的制度遺緒是什麼。

日本的戰後重建，美國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我們甚至可以說，日本戰後的民族國家體制，是在美國直接干預下硬生生建構出來的。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透過「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軍投降，結束了長達15年的戰爭。<sup>18</sup>美軍於8月28日登陸橫濱，建立了盟軍總部，開始了為期六年七個月的軍事占領。雖然從表面上來說，日本是由戰勝的盟軍所占領，但事實上真正具有決定主導權的，唯有美國而已。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主導下，美軍不僅在東京設立了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並且在日本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措施。

事實上，美國對日本的占領政策，並不是等到日本投降之後才產生；早在戰爭結束的三年前的1942年8月，也就是珍珠港事變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八個月，美國就已經為戰勝之後占領日本開始預作準備了。美軍在占領期間對日本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從憲法、議會、選舉制度、政黨政治、官僚行政、地方自治、司法體制、農地改革、財閥解體、勞動體制、教育體制、家族體制，可說無所不包，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泛深遠，很多人以「從上而下的革命」或「第二開國」稱之。<sup>19</sup>正如 Yumiko Iida 所指出，「日本社會被[美國]拋下一

17 關於東亞地域秩序的歷史轉變，簡要的討論可參見白永瑞(2006)、Duara (2008)。

18 所謂「十五年戰爭」，是從1931年的滿州事變（即中國所稱「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日本有長達十五年的期間處在戰爭狀態中。鶴見俊輔(2001[1956])率先使用這個詞彙，而後這個說法逐漸融入一般討論而廣被接受。

19 參見Dower (1999: 69-73)、赤澤史朗(1994)。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則是將室町末期至戰國視為「第一開國」、幕末維新為「第二開國」，而敗戰之後為「第三開國」（丸山真男 1998: 194）。

個使命，必須讓它的社會文化內容與被賦予的法律與制度形式相符，換句話說，是要在一個已經給定的國家(state)模型之上建立一個民族(nation)，而非在民族的特殊性之上建立國家」(Iida 2002: 70，楷體為筆者所加)。在諸多「被賦予的法律與制度形式」中，最具爭議性、乃至今天還不斷成為民族主義辯論焦點的，一是所謂「和平憲法」，另一則是與教育及思想文化相關的改革。換言之，美軍在占領期間的所做所為，恰恰是在表一的「公民—領土」與「族群—文化」這兩個場域留下許多制度化的遺產，也因此埋下怨恨的種子。

簡要地說，盟軍總部所進行的制度改革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去軍事化，另一則是民主化；其法理依據，主要來自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時所接受的波茨坦宣言中幾條模糊的規定。其中第六條稱：「必須永遠除去那些欺騙並誤導日本國民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權威及其影響。」第十條規定：「日本政府必須掃除所有恢復與強化日本國民民主傾向的一切障礙。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必須被確立。」從西方(美國)的觀點看來，日本之所以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主要是因為日本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加上軍部擅權，使得日本國民被集體欺瞞，誤信日本可以征服世界的妄想。為了使日本不再重蹈覆轍，除了將日本的軍事國家機器徹底解體、使其無法再從事戰爭之外，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讓日本民主化，藉由民主代議政體來防止軍部擅權、軍國主義再興。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美軍留下了兩個重要的制度遺產，其一為「和平憲法」，另一為透過言論管制、思想檢查與教育改革所進行的精神改造。以下分別從「公民—領土」與「族群—文化」兩個制度場域來加以分析。

### (一) 公民—領土的制度遺緒

在公民—領土制度方面，盟軍總部留下的最受爭議的制度遺緒，便是被稱為具有「和平主義」精神的日本憲法。這部由盟軍總部以英文起草主導、經過審慎翻譯與幾番外交折衝之後而制訂通過的戰後日本憲法，第二章題為「戰爭之放棄」，第九條條文為：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這就是知名的「憲法九條」的具體內容。這樣的條文在提出時便已充滿爭議，但為了改變世人心中「日本人骨子裡乃好戰的軍國主義」的看法，讓日本早日重返國際社會、結束盟軍占領統治，因此經過幾番折衝樽俎，最後在國會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sup>20</sup>然而，到了1960年新美日安保條約締結、乃至1990年波斯灣戰爭爆發，「憲法九條」都一再成爲爭議的焦點。

如果把規範性的倫理爭議暫時擱置一邊，僅從實然面來看，戰爭與武力的行使和現代國家的建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誠如韋伯所指出，現代國家乃建立在武力之上，撇開武力（含各種形式之對內與對外暴力）我們幾乎無法談論現代國家，因此韋伯把國家定義爲「聲稱(claim)對合法行使暴力具有壟斷之人類社群」(Weber 1946: 78)。在此情形下，要一個國家「聲稱」不保持戰力且永遠放棄戰爭，無異是將其置於有別於其他「一般正常」國家的特殊地位。儘管持相反論調者將和平憲法視爲是日本人足以誇示國際的獨特驕傲，但如果考量到這部憲法其實是經過盟軍總部提案、在並非完全自願的情況下產生，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許多人對這部憲法深懷不滿，並且要透過修改憲法九條來讓日本恢復成一個「正常國家」。<sup>21</sup>

加藤典洋在他知名的《敗戰後論》一書中再三強調，所謂「和平

---

20 有關日本戰後憲法制訂的峰迴路轉過程，可參見 Dower (1999, Part IV)。

21 和其他民族主義相關議題（如靖國神社）一樣，有關「憲法九條」的論議書籍可謂汗牛充棟，贊成和反對雙方各有理據，互不相讓。另也有一派人主張，憲法九條所根據的反戰與和平主義精神，其實在戰前的日本就已經有人主張；換句話說，憲法九條並非美國強加日本身上，而是在日本自己的思想傳統裡可以找到源頭。參見山室信一(2007)。

憲法」是在美國的脅迫底下產生，換言之，是在武力（原子彈威力）逼迫下被迫放棄武力。加藤典洋認為，這是戰後日本最大的「扭曲」（ねじれ）之一，然而這個乖謬的扭曲卻在日後因為種種理由而被遮掩壓制了。加藤指出，這個長期存在日本社會卻隱而未顯的乖謬扭曲，是導致日本社會人格分裂的來源。因此，我們一方面看到日本社會內部有「改憲派 vs. 護憲派」、「保守 vs. 革新」的對立，一方面又看到日本政府在因應外界有關戰爭責任與謝罪問題的指責時，左支右絀，無所適從的窘境（加藤典洋 1997）。

誠如高橋哲哉在評論加藤典洋時所指出，「被強押著放棄戰爭，對這件事的記憶是戰後日本對美國怨恨感情的泉源，反美民族主義的溫床」（高橋哲哉 2005: 154）。然而，和平憲法所衍生的「扭曲」，並不光只是在於它的產生是被戰勝國（美國）「強押著走」；如果放在國際的層次來看，不行使武力、放棄交戰權、不保有軍隊等，都使得日本在國際社會成爲特殊的一員。當前的國際社會基本上仍是一個現實主義當道的「權力平衡」狀態，要不保有武力而在國際社會生存，等於是仰人鼻息，而這也是實際上發生的狀態。一方面，日本在國防安全上必須仰賴美國，而美國也爲了防堵蘇聯共產勢力擴大而容許日本擁有自衛隊，並簽訂了美日安全保障條約。許多護憲反戰的人認爲自衛隊的存在等於變相擁有軍隊，本身已經違反憲法「不保有戰力」的規定，但諷刺的是，違反「被美國強迫制訂的和平憲法」而支持自衛隊存在的，也是美國。這使得加藤典洋所稱的「在武力威脅下被迫放棄武力」的扭曲之外，產生了更多扭曲，而日本的左派與右派，也因此在此「親美」與「反美」的立場態度之間，充滿了種種錯綜複雜的扭曲（參見下文討論）。1991年波斯灣戰爭落幕後，日本政府應美國之要求派遣自衛隊至波斯灣支援掃雷行動，在國內引發「自衛隊海外派遣是否違憲」的爭議。此後日本國內通過「國際平和協力法」，正式派遣自衛隊至海外參與聯合國的國際和平維持活動。主張修改憲法九條的人認爲，爲了讓日本能夠產生「國際貢獻」，必須修改和平條款，使日本成爲「正常國家」。換言之，在保守陣營與民族

主義者看來，這部和平憲法不只是「在美國武力威脅下被迫放棄武力」，同時也使得日本在國防上喪失自主性，在國際間成爲「不正常國家」。我們在下一節的分析裡將會看到，這種「被制度化的不平等／不正常」，如何成爲怨恨滋生的溫床，甚至成爲民族主義的「覺醒劑」，使許多人從左派陣營轉向民族主義。<sup>22</sup> 進一步說，這種「非正常國家」的陰影，一直存在衆多的日本民衆心中，並不限於右翼或民族主義者。例如過去扮演反對黨角色的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1993)也曾呼籲要讓軍備正常化，使日本恢復爲一個「普通國家」。這個背景也幫助我們理解，爲何這波新民族主義的訴求，能夠得到許多非傳統右翼者的反響。

## (二) 族群—文化的制度遺緒

另一方面，美國在日本留下的制度遺緒，還不只是「強押」著日本放棄戰爭、制訂和平憲法而已。爲了讓日本國民接受和平憲法，必須要推動和平主義教育，尤其要根除戰前日本的皇國史觀與軍國主義思想，徹底改變國民的「國家觀／世界觀」。因此，在國族制度的另一個場域——文化象徵場域方面，盟軍總部留下的另一個影響深遠的制度遺緒，即是透過言論管制、思想檢查與教育改革所進行的精神改造。如前所述，盟軍在日本所進行的工作，無論是政治改造或精神改造，都是根據波茨坦宣言第十條的規定：「日本政府必須掃除所有恢復與強化日本國民民主傾向的一切障礙。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必須被確立。」諷刺的是，盟軍總部在占領期間卻是藉著嚴格壓制言論、宗教、思想自由的方式來達到「確立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目標。

22 在這件事情上，波斯灣戰爭對日本國民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不可小覷。由於戰爭期間日本受限於和平憲法的規定，無法派兵增援，美國要求日本分攤高達 130 億美元的軍費（以當時幣值計算將近兩兆日圓），這個天文數字讓許多日本人有「不能出兵就得當冤大頭」的感覺。更糟的是，科威特在戰後公開向協助出兵攻打伊拉克的各國表示感謝，卻獨獨遺漏了出錢最多的日本，更讓許多日本人覺得忿忿不平。藤岡信勝便曾表示，波斯灣戰爭帶給日本的羞辱經驗，徹底改變了他的世界觀與政治立場。參見 Hein and Selden (2000: 18-9)。

僅就言論管制與思想檢查而言，占領時期的民間檢查部（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簡稱 CCD）在全盛時期曾雇用六千名會說英語的日本人來協助思想檢查的工作，檢查的對象包括報紙、雜誌、教科書、一般書籍、電台節目、電影、包含傳統戲劇在內的所有演出，可以說涵蓋了任何形式的媒體與劇場表現。直到 1947 年末，主要的 70 種報紙、所有的雜誌與書籍，在出版前都必須先通過審查。除此之外，CCD 在四年之間便抽檢了三億三千萬封的郵件，監聽的私人電話也有八十萬件(Dower 1999: 407)。如此龐大綿密的思想檢查網絡，目的無非是要徹底根絕軍國主義再興，任何與超國家主義（即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天皇崇拜、美化戰爭相關的言論，都在禁止之列。除了以美國觀點的「太平洋戰爭」取代「大東亞戰爭」、並重新改寫戰史之外，對盟軍不利的言論也常被封殺。<sup>23</sup> 有關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日文稱「原爆」）體驗雖然並未遭到全面壓制，但還是有不少與原爆相關的作品或言論遭到封殺。對於充滿爭議且留下巨大後遺症的原爆，盟軍希望日本民衆知道得越少越好。CCD 明文條列「必須刪除與禁止」的事項，洋洋灑灑有三十幾項之多，其中犖犖大者包括對盟軍總部的批判，對東京審判的批判，對美、英、中、蘇各國與聯合國的批判，對神國與民族主義的宣傳，對封建價值的讚美，對社會黑暗面（包括與占領軍相關的賣春、混血兒、黑市等議題）的渲染，乃至提及審查制度本身，都在禁止之列。由於提到審查制度的言論也被禁止，因此一般公衆是在「幾乎不知道有審查制度存在」的情況下接受

23 日本戰時內閣將珍珠港事變之後的戰爭稱為「大東亞戰爭」，目的在於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因此，「大東亞戰爭」的名稱，本身即隱含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所進行的聖戰之意。戰後美軍占領時期，認為「大東亞戰爭」含有濃厚的軍國主義思想色彩，一度禁止使用此一名詞，而以美國慣用的「太平洋戰爭」來取代。盟軍總部從 1945 年 12 月開始，在各大報連載《太平洋戰爭史》，目的就是為了洗刷民眾「大東亞戰爭」的印象，並重新從美國的觀點來詮釋戰爭。雖然太平洋戰爭迄今已經成為眾人慣用的語彙，但由於「太平洋戰爭」是美軍強加的用語（敗戰前日本未曾使用此一名詞），許多人（尤其右翼支持者）對此一稱謂仍存有抗拒感；反之，刻意使用「大東亞戰爭」一語的人，有些是為了回復當時歷史的原貌，有些則隱含肯定戰爭價值的含意。雖然這看似只是一個小小的用語變更，背後卻具有巨大的意義與效果。其中最諷刺的是，美國把日本自認的「大東亞戰爭」重新定位成以美國為中心的「太平洋戰爭」，無形中加強了太平洋戰爭為「日—美對決」的印象，忽視這場戰爭與東亞近鄰諸國的關連，從而加速了日本人忘卻日軍曾在這些地區犯下的罪行(Dower 1999: 419)。

資訊的(Iida 2002: 71)。美國史家 John Dower 指出，這樣的作法比起日本戰前的軍國主義還不如，讓人看到美國的偽善。直到 1930 年代末期，未通過日本軍部審查的文字還被允許以「○○」或「××」的方式刊出，讀者一眼就可看出此處未通過審查而被刪除；但在美軍占領時期，即使這樣的表現也不被允許，因為美國要維護自己推行民主自由的形象，不容許人們察覺有審查制度的存在。Dower 更舉出不少事例，認為美軍的審查已經到了「神經質」乃至「可笑」的地步。<sup>24</sup> 如此嚴密而廣泛的思想檢查與言論管制，幾乎等於是把戰敗者（日本）的官方宣傳改成戰勝者（美國）的官方宣傳。即使是想要描述日本走向戰爭的國際背景（如大蕭條的恐慌、全球資本主義的解體、保護主義與獨裁政治的潮流、既對日本造成壓力又同時被當成典範的歐美帝國主義、西方的種族歧視、反殖民的泛亞洲主義等），都被認為有可能引發動亂而遭到禁止。唯一剩下的真理，就是美軍對戰爭的詮釋與看法(Dower 1999: 410-413)。我們幾乎可以說，整個「真理」與世界觀的典範，完全被頭下腳上一般地顛倒過來了。原來要誓死消滅的敵人，現在成了自己要完全模仿吸收的對象，而原來的自己反而瞬間成了必須要被全盤否定的敵人。這個典範轉移的過程，不只是透過言論統制與思想檢查，更透過教育制度與教科書的改革。這也為日後的歷史教科書爭議，埋下了種子。

美軍對日本進行教育改革主要也是依據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政府必須掃除施行民主政治的一切障礙。事實上，美國在日本敗戰之前就已經開始積極規劃戰後日本的教育改革，占領之後盟軍總部設立了民間情報教育局，並針對教育發表了知名的「四大指令」。首先，盟軍總部在 1945 年 10 月 22 日發表了「關於對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的備忘錄，明確要求日本政府「禁止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普及，全面廢除軍事教育的學科和教練」，同時「要獎勵符合

---

24 例如一張美軍部隊的照片中因為出現狗而不得刊出，理由是有損部隊的尊嚴。更常見的情形是，有關軍隊及其標誌都從視覺記錄中刪除，彷彿只要消除任何有關占領的影像資料，就可以讓日本人忘卻失去主權這件事(Dower 1999: 419)。

議會政治、國際和平、個人威信的思想、集會、言論、信教的自由等，以期基本人權思想的各種概念的教育及實踐的確立」。該指令並且要求對教職員進行整肅，對鼓吹軍國主義或反對占領的教職員予以免職。對教育內容（含教材與教學科目）進行嚴格審查，任何有關軍國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內容都必須刪除。10月30日，盟軍總部發出第二道指令，針對第一道指令有關教職員整肅的具體化方針，要把與占領政策有所抵觸的教職員從教育體制中清除。基於這項指令，制訂了「教職員的開除、禁止就職與復職」等有關法令，建立了都道府縣教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具體執行整頓工作。第三道指令為廢除國家神道的指令，於12月15日發佈。這項指令要求日本國家與神道分離，廢除了以神道為國教的制度，同時在教育制度中排除神道的內容，使神道從強制信仰成為自由信仰。第四道指令則是關於「停止修身、日本歷史與地理」。由於皇道思想與軍國主義等意識形態大多透過上述三個科目傳授，盟軍總部除了廢止這三科目的教學外，並下令收回教科書，以免這些教科書繼續流傳產生影響（田桓 1990: 440-441）。此外，盟軍總部對於其他教科書（如《國語》）的內容也嚴加檢視，以防止軍國主義或皇道思想藉由教育繼續擴散。在此情形之下，許多戰前的教材已經不再適用，必須重新編纂教材。然而一開始由於開學在即，新的教材無法即時編出，只好暫時沿用舊的教材，再盡可能把其中有關皇國思想與軍國主義的內容塗去，因此出現了所謂「墨塗教科書」。當時的做法是將學生手上已有的教科書回收，由教師在開學前夕一本一本把規定必須刪除的內容或字句塗去。對學生來說，僅僅在兩個月之前還在使用的教科書，兩個月後卻被塗得面目全非；對教師來說，兩個月前還在課堂上大力鼓吹的信念，現在全部成了錯誤的觀念，被視為禁忌。這種突如其來的價值逆轉，對當時的學生及教師來說，都是很大的心理衝擊（Dower 1999: 247）。翌(1946)年，由文部省編寫的新版國定教科書問世，開始在學校中使用，其後更在美國教育考察團的建議下，開放教科書由民間編寫、政府審定。然而，這些經過文部省審定的教科書，最後還必須送到民間情報教育局審閱，以

確保這些教材內容沒有違反盟軍的占領政策。爲了便於美方審閱，這些教科書在送審的同時還必須附上英譯本，而由於語言與文化的隔閡，也造成了雙方不少誤會與摩擦。

民間情報教育局所執行的教科書審查制度，審查標準大致上分爲三類。凡與以下內容相關者，皆須刪除（ウンダーリック 1998: 260）：(1)提倡軍國主義及侵略的精神：稱頌戰爭，美化軍事偉業，歌頌戰爭英雄，或將爲天皇或祖國而死視爲名譽。(2)與超國家主義相關的內容：大東亞共榮圈主義的擴張，將日本視爲世界之首、以日本爲中心的「八紘一宇」的想法，爲了保衛天皇或國家發展而犧牲性命的大和魂，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及原則相違背的教育內容。(3)與天皇制相關的內容：將天皇當成神來崇拜，把爲天皇而死視爲義務，從屬於天皇勅令的忠誠心。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這些被明文規定必須刪除的內容，正是五十年後小林善紀等人透過《戰爭論》之類的書籍嘗試要恢復的失落之物。

占領當局所進行的教育改革，甚至徹底到試圖將日本的書寫系統完全改變，放棄漢字與假名，完全以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來取代。這項嘗試曾經在部分地區的學校試行過，但後來半途而廢（茅島篤 2000）。這項改革如果真的成功，則不僅僅是教育，整個日本的語言文化都將受到根本影響。和先前提到的和平憲法一樣，日本戰後實行的一連串教育改革，在很多人眼中看來其實也是「被強押著走」。在這個過程中，整個民族的歷史被改寫了。這個改寫歷史的過程不是自發的，甚至稱不上是「被動的回應」，而是根據戰勝者的立場來改寫歷史，以致於連日本人原來習慣稱呼的「大東亞戰爭」也成爲禁忌的字眼，必須以美方所稱的「太平洋戰爭」來取代。凡是與占領政策抵觸、乃至批評占領政策的言論，都遭到壓制與禁止。這樣高壓的作法也許可以讓皇道思想、軍國主義與超國家主義暫時銷聲匿跡，但我們不難想見，一旦這些外在的壓制力解除之後，這些勢力依舊會捲土重來，而且因爲經過壓制而累積的怨恨，使得這些思想勢力在反撲的時候態度更兇、力道更猛、更理直氣壯而認爲自己具有正當性。

如前所述，美國的言論管制政策嚴密到「要讓民衆不知有審查制度的存在」，即使人們後來逐漸發現言論管制的存在，仍不甚了解詳細的具體內容。一直到 1980 年代以後，許多檔案公諸於世，有關占領政策的書籍陸續出版，人們才開始對占領時期發生的事情逐漸有所理解。1979 至 1980 年間，知名的保守派作家江藤淳親赴美國華盛頓，查閱存放在各機構的占領軍檔案資料，針對美軍占領時期的言論管制與思想改造政策撰寫系列專文，在《諸君！》與《文藝春秋》等雜誌上連載，其後分別以《被遺忘的事與被迫遺忘的事》(1994[1979])與《被封閉的言論空間》(1994[1989])為題結集出版。在《被封閉的言論空間》一書的文庫本封底，言論審查被說成是「爲了達到殲滅日本思想與文化的目的」，而它所帶來的後果是「由日本人的自我破壞而產生的新禁忌的自我繁殖」。當人們對這些曾被視爲禁忌的占領政策詳情內幕產生越來越多理解、發現歷史原來並非過去所認知的那麼回事的時候，怨念逐漸醞釀累積，終於在 1990 年代之後以「歷史修正主義」的面貌浮現。<sup>25</sup>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以爲在美軍占領時期日本的思想界毫無言論自由可言，恐怕也不盡正確。相反地，在美軍占領時期，戰時受到壓制檢肅的左派思想、自由主義與反戰主張等言論，則獲得了相當自由的空間，蓬勃發展(Iida 2002: 74-77)。也正因爲左派思想此時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產生更多的影響，這更加深了保守陣營的憤恨不滿。然而，美軍對於左派思想也並非毫無顧忌，尤其韓戰爆發後，美國爲了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對日占領政策也做了不少調整，與當初宣稱的理念已經有所違背。因此，儘管占領當局所進行的一連串改革措施一度受到左派與反戰知識份子的歡迎，但終究還是在知識文化界造成普遍的苦悶壓抑與不滿，畢竟美國的政策與態度並非根據一以貫之的

---

25 在日本，因爲發現自己「過去的歷史認識有誤」而產生轉向的人不少，例如此處所引的江藤淳、前面提到的藤岡信勝，原來都屬左派陣營，後來因爲接觸到新的材料而產生轉向，成爲保守派或右派。另外，根據筆者在靖國神社與前往參拜的年輕人所做的訪談，也發現其中有人是讀了保守派或「創作會」成員的著作後，感覺到自己「被以前所學的歷史騙了」。

理想或原則，而是基於本國利益的戰略考量。這也使得我們必須進一步考察美國對日戰後改革及其制度遺緒被如何評價的問題。

### （三）不徹底的改革及其遺緒：「左／右」與「親美／反美」的扭曲<sup>26</sup>

美國對日本所進行的政體改造，包含其正當性與評價，學界有不少討論。一種比較激進的看法認為，美國對日本的改造根本缺乏正當性，其目的不過是要將日本打造為符合美國利益的國家，使日本成為美國的附庸，以利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勢力擴張。另一種看法則認為，美國對日本的占領與改造雖屬必要且正當，但卻為德不卒，不但未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保留了天皇制，對日本在東亞的戰爭罪行未徹底清算，而且對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網開一面，致使許多戰前的政治人物能夠在戰後繼續活躍於政治舞台。換句話說，正是因為美國的包庇與縱容，日本戰前體制並未徹底清除乾淨，反而與戰後體制藕斷絲連，而右翼勢力也因此獲得喘息與繼續滋長擴大的空間。<sup>27</sup>

對於美軍占領以及戰後體制改革的正當性評價，因牽涉層面過廣，非本文所能處理，也不是此處的關心；然而，僅就本文所關心的「怨恨」的制度根源，有幾點事實必須加以考慮。首先，美軍的制度改革的確並未與戰前體制徹底一刀兩斷，而戰前的右翼保守勢力，也並未被徹底根除。這裡面最引人矚目的，當推天皇與天皇制問題。美國並未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並容許日本在新憲法中以「象徵天皇制」保留天皇制度，據稱主要是為了安定政局，避免造成日本社會的解體。此外，為了便於實行間接統治，美軍與保守派當權的日本政府合作，也的確造成戰前與戰後體制藕斷絲連，使得日本無法徹底反省自身的戰爭責任。例如曾經活躍戰前日本政壇、名列A級戰犯而被

26 本小節文字主要是為了回應兩位審查人有關「制度改革不徹底」以及日本的「左／右派」與「親美／反美」間的矛盾所加。感謝兩位審查人的提點。

27 有關美軍占領與對日政體改造的討論與各種不同評價，可參見 Dower (1999)、中村政則(1994)、田桓(1990)等。

捕入獄的岸信介，後來獲得不起訴處分而被釋放，日後更進一步出任首相與自民黨總裁，與美國簽訂了備受爭議的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政府與保守勢力之間的共生互利關係，也屢屢成爲左派抨擊的對象。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事實是，無論美國對日本的政體改造是否符合正義、是否具有足夠的正當性，從事後的發展來看，這裡面都充滿太多美國自身利益的考量與算計。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蘇兩強對峙的態勢逐漸明朗，美國的對日政策也有了明顯的變化與調整。原先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得以蓬勃發展的左翼思想與言論，在反共的氛圍中開始受到壓抑；而爲了防堵共產勢力在遠東地區擴張，美國更變相容許日本擁有武力、鼓勵發展自衛隊，並在後來簽訂了美日安保條約，容許美軍在占領時期結束之後繼續在日本囤駐，保有基地，使得日本在軍事與政治外交上成爲美國的附庸。換言之，美軍在占領時期所進行的種種改革措施，儘管有波茨坦宣言等各種各樣冠冕堂皇的理由與依據，但其最終結果，不過是爲了將日本打造成一個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的國家。<sup>28</sup>

由於美國在日本戰後重建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且由於美軍占領時期的制度改革充滿了許多不完全、不徹底的矛盾與扭曲，使得我們在理解日本的左、右派以及「親美」、「反美」之間的關係時，增添了许多複雜的因素。如果我們從一般「右翼＝資本主義＝保守，左翼＝社會主義＝激進」的常識性框架來看，也許應該得出「右翼＝親美，左翼＝反美」的推論；但在日本，圖像卻複雜許多。如前所述，美軍占領時期解除了戰時的言論管制（雖然以新的言論檢查取代），使得左翼思想重見天日，共產黨也因美國所推行的民主政體獲得合法化，左派勢力大幅成長，甚且躍居知識界的主流；而日本左派對於美軍占領時期的制度改革，尤其是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方面，基本上是擁護支持的。然而，對於憲法中保留的象徵天皇制，以及美國以反共爲

---

28 美國處理日本的態度要放在其東亞政策的脈絡中來看；相關討論與評價，可參見 Johnson (2000)、Chomsky (2005)、Harootunian (2004)、Hein and Selden (1996)等。

名在遠東地區的所作所爲（包括奠定了冷戰體制的美日安保條約），左派則是保持批判反對的立場。另一方面，戰前以「尊皇攘夷」、「護持國體」為號召的日本右翼與保守勢力，在戰後雖然一度銷聲匿跡，但由於美國選擇與保守勢力的日本政府策略結盟，非但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甚且在憲法中保留了作為「國體」象徵的天皇制，使得右傾思想仍保有許多生存發展的空間，右翼團體也得以在戰後繼續鼓吹「皇國史觀」或「天皇國體論」。美日安保體制確立了美國與日本保守派之間的結盟，而日本也的確在美國的軍事庇蔭下享受了高度的經濟成長，使得日本主流社會充滿了親美的氣氛。然而，如果我們因此認為右翼／右派民族主義者對美國必然心存好感，恐怕將悖離事實甚遠。事實上，如果我們僅僅把右派民族主義視為是美國包庇縱容日本右翼的結果，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這波新民族主義浪潮，包含了許多對美國的批評與怨恨。這也是本文嘗試提出解釋的矛盾之一。

總而言之，在日本，「左／右」的區分與「親美／反美」從來就不是可以一刀兩切的對應關係；就現實來說，無論左、右，都在某種程度上同時受惠於美國的戰後政策，同享其利，但其內部對於美國也因為情境、議題與脈絡的不同，而有「支持」與「批判」等極大的分歧。<sup>29</sup> 在此情形下，日本戰後的發展充滿了種種的壓抑與扭曲，久而久之累積了不少怨恨，也就不難理解了。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這些壓抑與扭曲所造成的怨恨長期在日本戰後社會醞釀發酵，終於在冷戰結束後開始一一爆發出來，成為新一波民族主義的動力來源。以下，筆者將援引德國社會學者舍勒的怨恨理論，從小林善紀的《戰爭論》以及「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成員的言論來檢視當前日本民族主義論述中的怨恨心態。

---

29 關於日本「左翼」、「右翼」的區分，原本就是一件十分複雜而困難的事情，經常隨著議題與時代脈絡而變化，而由於美國因素的加入，使得這個區分更加混雜。有關「左／右」與「親美／反美」之間的扭曲與分歧，可參見吉見俊哉(2007)、松本健一(1995)、阿部潔(2001，第2章)等。

### 三、解析新民族主義背後的怨恨心態

怨恨心態作為現代性的主題，可以追溯到尼采的《道德系譜學》(Nietzsche 1969)，但真正將此一命題充分發揮並作進一步社會學與現象學分析的，當非舍勒莫屬。舍勒對於怨恨的本質、形成條件與後果，都曾做過精闢的分析。<sup>30</sup> 首先，舍勒根據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的方法，抽絲剝繭，指出怨恨與「仇恨」不同。怨恨並不是單純的仇恨，也不是一時的情緒，而是一種反覆咀嚼、長期累積的心理狀態，因此舍勒在其德文原著中保留了"*ressentiment*"的法文字，因為他認為在德文中找不到相應的字眼可以說明怨恨的「反覆咀嚼」的性質。怨恨必然伴隨著「報復衝動」與「無能意識」，因為有能力報復的人在完成報復的同時，復仇的心理也獲得了滿足，不會產生怨恨。只有那些缺乏報復能力、或必須延遲報復的人，才會在心中累積怨恨。此外，怨恨與嫉妒及競爭慾望有關。因為復仇的慾望無法得到滿足、或是因為渴望獲得的東西無法得手，心懷怨恨的人常認為「別人擁有之物，自己也應該擁有」，或是「別人所得到的東西，其實應該是屬於自己的」。準此，怨恨的產生與兩個社會學條件有關，一是理論上的可比較性，一是現實裡無法克服的不平等。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裡（如印度的卡司特體系），因為在下位的人在理論上無法和上層階級的人相提並論，因此即使上下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等，也不容易產生怨恨。反之，在一個號稱人人自由平等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理論上」是可以相互比較的，但如果彼此之間在財富、權力等可欲之物的分配上存在無法克服的巨大落差，怨恨便容易產生，因為居於劣勢的人時時覺得「對方所擁有的，其實應該是屬於自己的」。

---

30 見 Scheler (1998)。中文學界對於舍勒的怨恨理論，過去已有一些討論，此處僅簡要概述。進一步闡釋可參見江日新(1999)、劉小楓(1994, 1996)、汪宏倫(2006)等。

從上述的觀點來看日本的民族主義，我們可以發現，怨恨的社會學條件在不同時空、不同意義下都相當具備。就「可比較性」與「實際存在的不平等」來說，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但打敗了原來以天朝自居的中國，更打敗了白種人的俄國，可說不可一世，躋身歐美列強之林。日本不僅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而且與列強競逐版圖，在亞洲擴張勢力，強取豪奪。激烈競爭的結果，日本最後卻是以慘敗收場，不但在精神與物質上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投降之後更是被戰勝的美國「強押著走」，不但「在武力威脅下被迫放棄武力」，制訂了舉世罕見的和平憲法，同時國民整體在戰勝者的指導下進行了思想與精神改造，完全否定自己過去的歷史與價值。我們可以想見，這個充滿軍事暴力與象徵暴力的過程必然激發起強烈的報復衝動，但卻又因武力與科技不如人而產生無能意識，長此以往，必然造成極大的苦悶與扭曲。

根據舍勒，怨恨乃是一種「反覆咀嚼」的「敵意」；作為一種意向性的負面情緒，它同時伴隨著「報復衝動」與「無能意識」。根據這個線索來考察日本當前新民族主義的論述，我們的確發現其中充滿了許多「反覆咀嚼的敵意」，而「報復衝動」與「無能意識」也呼之欲出。具體一點來說，右派民族主義者對於「敗戰」這件事本身並沒有太多的怨念；他們所無法接受的，是隨著敗戰而來被加諸日本之上的種種制度與措施，包括東京審判，以及對美軍占領時期所留下的制度遺緒（和平憲法與「東京裁判史觀」）。東京審判與和平憲法分別是高度複雜的規範性議題，針對這兩個議題所做的研究與討論也已經汗牛充棟，此處的分析並非要直接對東京審判或和平憲法進行臧否評論，而是要如其所如地解析：這兩個條件作為既定事實，如何引發敵意而被「反覆咀嚼」，一方面成為「報復衝動」的對象，同時又引發了「無能意識」。

在 1990 年代出現的歷史修正主義熱潮，首先要推翻的即是所謂「東京裁判史觀」或「自虐史觀」。把過去的史觀稱為「自虐」，本身除了流露強烈的價值判斷之外，更隱含了怨恨的憤懣情緒。為什麼

過去的史觀被認為是「自虐」，民族主義者又是如何看待戰敗與占領時期的歷史，我們可以從幾個關鍵人物的言論裡找到線索。在一場主題為「超越『自虐史觀』」的座談會上，<sup>31</sup> 時任「創作會」會長的西尾幹二以〈八月十五日以前的日本人，以後的日本人〉為題發表演說，其中提到：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之前和之後，很多人雖然看起來是同樣一個人，但已經無法理解自己了。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在那之前和之後，典範已經改變，局勢完全改觀了。

反過來說，八月十五日以前的日本人，也無法預見十五日以後的日本。對敵人的軍艦進行自殺式攻擊的特攻隊志願兵的宿命之愛，對很多日本人來說，八月十五日過沒多久就已經轉眼變成無法理解的事情。在那之前的日本，從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來完全無法理解的現象，除此之外還有很多。<sup>32</sup>（西尾幹二 1997: 13）

在同一場座談會上，接在西尾幹二之後的井尻千男以〈被占領的七年間發生了什麼？〉為題發言，首先抨擊了美軍占領時期的言論審查制度與歷史教育問題，接著說：

雖然西尾先生剛才說是典範的轉移，我認為被占領的七年間的言論統制使得我們今天逐漸無法理解歷史。

占領終了の昭和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以降，作為主權國家的我們，或是政治家，以什麼樣的方式訴說歷史，這件事時至今日甚至已經無法將之歸咎於GHQ[筆者按：盟軍總部]。我們已經膽怯了嗎？為什麼被徹底洗腦、以致於連回復歷史

31 該場座談會乃為了紀念「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的設立，於1997年3月31日在東京新宿舉行，「創作會」的要角如藤岡信勝、西尾幹二、小林善紀等人皆出席參加。

32 除非特別加註，本文所有引文皆由筆者自行翻譯。

連續性的語言都喪失得一乾二淨呢？我必須要說，這實在是個深奧的謎。……我們因為曾被占領，以致於迄今還無法回復歷史的連續性。從那時以來已經四十五年過去了，這四十五年間我們一直生活在 GHQ 的言論統制遺緒之中。（井尻千男 1997：28）

井尻千男所稱的「GHQ的言論統制遺緒」，很大一部份是指一般右派所稱「東京裁判史觀」，以及依據這種史觀來寫作的歷史教科書。「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宗旨書指控，過去的歷史教科書僅僅反映了美國的史觀，甚至把「敵國的宣傳」當成事實來記述：

然而，戰後的歷史教育卻忘記了日本人應該繼承的文化與傳統，喪失了日本人的尊嚴。尤其是在近現代史方面，日本人被當成好像子子孫孫都要承受不斷謝罪的命運的罪人一般。冷戰結束後，這種自虐的傾向更進一步強化，乃至現行教科書竟把往日敵國[筆者按：指美國]的宣傳原封不動當成事實來記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實行這種歷史教育的國家。（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 1997: 314）

在「創作會」的成員看來，由於這些教科書將日本所從事的戰爭視為犯罪行爲，「日本曾經做過什麼、在世界扮演過什麼角色，（這些教科書）一詞未贅，這樣的歷史讀來令人黯然。對日本的陰暗面積極描述，光明面卻幾乎不提，簡直就是要教給學生將日本空洞化的歷史」（田中英道 2002: 144）。在這些言論中，我們的確看到一種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咀嚼」的負面情緒，針對戰後的言論管制與歷史教育而發；而諸如「過去的歷史變得無法理解」、「我們已經膽怯了嗎？」，「爲什麼被徹底洗腦，以致於回覆歷史連續性的語言都喪失得一乾二淨？」，乃至「喪失了日本人的尊嚴」、「承受不斷謝罪命運的罪人」、「令人黯然」的種種嗟嘆，背後反映的是一種對戰後

四、五十年來情勢無法改變的「無能意識」。濤川榮太在前述座談會上，更以一種自憐自傷的口吻說：

我不是那種要回到皇國史觀的人。但是，把過去日本的歷史與文化全部否定，作為一個民族來說實在很可憐，也很沒有建設性，我只是想指出這點而已。（濤川榮太 1997: 41）

這種「覺得自己實在很可憐」的無能意識，伴隨著下文將進一步討論的「被害者意識」，構成了日本戰後民族主義的基調之一。事實上，把過去的歷史教育稱為「自虐」，本身已經隱含了一種無能意識，先入為主地把自己放在「被虐待」的受害者位置：

再這樣下去日本的國家將會解體。反日史觀的底層是徹底的日本國否定論。……這個國家的戰後歷史教育，到現在還繼續被由這兩者[按：指戰後的美國與蘇聯]的怨念史觀，復仇史觀，反日史觀所混合釀生的歷史觀所支配著。戰後五十年，這個國家的歷史教育居然就是被這種終將讓自己的國家更加衰敗、軟弱、走向滅亡的史觀所主導。

重申一次，原本歷史教育就是要學習本國的過去、歷史與文化，對於好的地方保持尊嚴與自信，對於應該反省之處則謹記勿重蹈覆轍。為了這個目的，應該反省之處與值得稱許之處，兩者都應該好好教授。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必須教授事實。若不這麼做的話，我們就無法教給孩子與年輕人明日的希望、力量、對未來的挑戰，無法教他們如何創造更好的社會、更好的生活方式。……說到極端，（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對孩子來說是虐待。虐待自己國家的歷史，等於就是在虐待自己的國民，虐待孩子，乃至於虐待未來的日本。歷史教科書每況愈下，是對孩子的侵害。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財政、行政的構造，已經給孩子留下了未來六十年都還

不完的赤字國債。歷史教育是構成人類生存的骨幹，我們除了留下赤字國債之外，連孩子的生存骨幹這部分都加以侵害了，這樣下去的話這國家未來將伊於胡底。（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 1997: 191-192）

值得注意的是，「孩子」或「下一代」在民族主義的修辭中經常出現，因為它代表了純潔、無辜、繼起的生命與未來的希望(Anderson 1998)。「創作會」在這裡特別強調「虐待孩子」，更是凸顯其作為「無辜」的受害者角色。

既然過去的歷史教育是「自虐」，那麼，為什麼「創作會」的成員要把與「自虐史觀」相對的看法，稱為「自由主義史觀」呢？我們可以從西尾幹二的一段話得到線索：

要說起人的自由，那麼歷史的解釋與人的自由有很深的關連。關於自己的歷史要如何解釋，處處迷惘之時卻有來自異國的政治介入，這讓人感到難以言喻的不快。這是對我們自由的侵犯。

不消說，反省歷史，會因為每個人的想法而有不同。但被某一種特定的歷史解釋強迫押著走，每個人心中都會有抗拒感。歷史解釋是人的自由或思想自由的根本，這樣的想法近年來已經逐漸深化。（西尾幹二 1997: 26，底線為筆者所加）

原來「自由主義史觀」所稱的自由，並非政治哲學傳統裡的自由主義，而是指解釋歷史的自由。「自由主義史觀」雖然打著自由主義的名號，卻是明顯對"liberalism"的扭曲與濫（誤）用，這點固然已經遭到許多批判，但換個角度來看，這段話的確也點出了某些問題的癥結，而也正因為如此，「自由主義史觀」與「創作會」才能引起許多共鳴。具體地說，對自我歷史過去的反省與批判，固然必要，但這必

須是在「由自」而非「由他」的狀況下產生，尤其不當在武力脅迫的情形下進行，否則反省並非真心反省，而反彈必然也隨後而至。許多人認為，日本缺乏對戰爭責任的徹底反省，與美國在韓戰期間爲了自身利益的縱容包庇有關，這點固然不錯，但美國在占領時期前後以極端暴力（包含軍事暴力與象徵暴力）的方式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日本之上，引發怨恨與不滿，這也是導致日本無法真心接受反省的原因。換言之，與其說美國包庇縱容日本右派，毋寧說，美國所埋下的怨恨種子，使得日本一般大眾的反省無法深入，而右派思想也得以伺機而起並獲得廣大共鳴。

在新民族主義的論述中，「報復衝動」則是透過改正歷史（以及下文將要討論的改正憲法）彰顯出來。繼任「創作會」會長的田中英道指控，過去義務教育的教科書，都是被左派的大學教授所把持，成爲美國的附庸（田中英道 2002: 8, 34）。這樣的指控也許過於誇大，但在美軍占領時期，左派的歷史書寫受到鼓勵，成爲戰後的主流，則是不爭的事實。他認爲美軍占領時期的教科書檢閱，將下列五項重要的內容刪去了：(1)與天皇有關的用語（如現御神、現人神等），(2)與國家擴張有關的用語（如八紘一宇、皇國之道等），(3)與愛國心相連結的用語（如國體、國家、國民的、我國等），(4)日本國的神話起源或成爲英雄與道義人物的皇族，(5)與神道或祭祀、神社相關的記述。正是因爲過去曾經遭受過這些壓抑，所以現在要把這些全部回復過來（田中英道 2002: 114）。後來加入創作會的小山常實歸納出戰後教科書全盤傾向的五大特徵：(1)在對外關係的敘述上，缺乏防衛的觀點，也缺乏地緣政治的概念。換言之，日本過去涉入的戰爭其實帶有防衛性質，但這樣的性質卻不被提及，而逐漸被經濟主義的觀點所取代。(2)不批判外國，且對共產主義懷有根深柢固的幻想，因此不只不批判美國，對鄰近（對日本造成威脅）的中國、朝鮮、蘇聯等，幾乎毫無批判。(3)從西歐理念出發、斬斷日本的現實；換言之，以西歐的立憲主義與民主主義做爲評價標準，日本被描述成一個比歐美晚了一個階段進化的國家。(4)平等主義、直接民主主義的歷史觀，只著重普遍選

舉與社會運動，對權力與權威未加區分。(5)漠視存在於東亞的華夷秩序體制與國際法體制之間的對立。在作者看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東亞，乃是「華夷朝貢秩序」與「國際法體制」的對決。小山認為，從國際法的觀點來看，日本併吞朝鮮與進軍滿州都是可以被合理化的事情，但由於現行教科書缺乏這個觀點，使得日本被描述成侵略者。基於以上五項特徵，現代教科書「全盤否定本國歷史、反日原理主義的性格」終告確立，而《新歷史教科書》的任務，正是要擺脫上述五項束縛（小山常實 2001: 222-229）。

在《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創立聲明》中，「創作會」對自己的目標與意圖做了清楚的陳述：

把明治時期的國家本身當成「惡」，把日本近現代史全體當成犯罪的歷史而加以定罪書寫。……我們只能說這是永無止盡的本國史喪失洪流中，國民志節情操江河日下的象徵一例。

究竟為什麼會如此呢？日本人在戰後五十年間，讓世界對立二分的美蘇超級強國的歷史觀曖昧地在國內共存。歷史教科書是這兩者混合的很好的例子。這兩種歷史觀本來在理論上應該相互對立，但因為作為對日戰勝國而否定日本過去歷史，兩者共存在戰後日本知識人的腦袋裡，合而為一。而其結果，乃是日本自身歷史意識的喪失。

眾所周知，冷戰結束之後，東亞的狀況不容輕忽。無論哪個國家都有獨自的歷史圖像，各自的歷史意識也有所不同，要與他國共有歷史認識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尤其我國已經走出了幼弱民族主義的階段，如果現在要跟那些正處於初期民族主義爆發期的鄰近亞洲諸國在歷史意識上相互妥協的話，結果只可能是我國的屈服。這只會讓上述歷史喪失的症狀雪上加霜、病情加重而已。

我們在此要向各界強烈呼籲，必須要匡正戰後五十年來的想

法，回到「歷史為何物？」的本義，如任何國家一般毫無例外地努力回復本國的正史。我們的目標，是要製作並提供具有良知而能夠給日本下一代帶來信心的教科書。（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 1997: 320-321，底線為筆者所加）

由此可見，「創作會」的目的，乃是要擺脫美軍占領時期所留下的影響，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恢復「國史」的寫作。除了《新歷史教科書》之外，「創作會」的成員們還出版了《從戰後歷史教科書裡被抹消的人們》、《教科書沒教的歷史》等一系列書籍。從標題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連串的出版品，目的都是要挑戰戰後的教科書內容典範，試圖恢復那些在戰後被壓抑的記憶與被抹消的歷史。

在前述聲明中提到日本必須要「如任何國家一般毫無例外地努力回復本國的正史」，背後也透露了另一個重要的訊息，即右派民族主義者一直認為日本和其他國家相比是個「例外」。這也是怨恨者的另一項特徵：價值攀比。怨恨者由於無法認知價值的高低真偽，因此他們不是就事物本身的價值來進行判斷，而是藉由與別人比較來確認事物的價值(Scheler 1998: 37-57)。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在面對外界的指控時，便是經常以這種態度來面對。許多人在評論日本的戰爭記憶時指出，日本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所遭受的損失與付出的代價，但卻看不到自己透過殖民主義與侵略戰爭帶給別人的巨大災難與苦痛。民族主義者在面臨這種指控時，便是以一種「比爛」的方式來面對。換句話說，就算自己曾經幹過壞事，但這些壞事比起其他人所幹的壞事並不見得更壞，而且更重要的是，幹下更大壞事的其他人（在全球恣行帝國侵略、人種歧視、資本壓榨與殖民掠奪的歐美諸國）並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是戰敗的自己遭到極不公正的對待。這是「可比較性」與「競爭慾望」的翻轉：別人所得到的是自己應得的（但事實上卻無法得到），自己所承受的其實別人也應該承受（但受到指責的只有自己，犯下更多更大罪行的他者卻逍遙法外）。這更進一步加深的受害者意識與怨恨心態，使得民族主義者更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更不

願對加害行為道歉。例如在慰安婦問題上，田中英道認為，德軍在占領地設置軍事賣春所、蘇聯也「強制徵用」猶太或波蘭女性，這些事情沒有人追究、也沒有人指責，只針對日本這樣的特定國家追究責任，有欠公平（田中英道 2002: 50）。言下之意是說，因為種族歧視的緣故，同樣的行為只有日本被追究責任，西洋人的犯行卻不必被追究。

由於覺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對待，怨恨者無法公正地評價事物，看待其他人的眼光也是極端扭曲的。怨恨者看不到自己的惡，看到了也不願承認，只會指責別人比自己更可惡。例如談到戰爭的殘虐程度，小林善紀對各國軍隊的殘虐行為加以比較，指稱中國軍隊其實比日本人更殘忍。而為了反駁南京大屠殺當中有關日軍殘暴行為的指控，田中英道甚至認為：「輪姦後剖腹」、「要僧侶進行性行為，若不從則處以宮刑」等獵奇趣味，只有中國人才幹得出來，日本人沒有這種卑劣品味（田中英道 2002: 93）。字裡行間，對中國的偏見與歧視可說呼之欲出。在反駁南京大屠殺時，小林不但從細節上論證那些被當作南京大屠殺例證的照片乃是偽造的之外，甚至認為照片中有些受害者其實是日本人，卻被移花接木成中國人。真正的受害者其實是日本人，中國人反而是加害者。換言之，在怨恨者的眼中，整個歷史是被顛倒過來看的：所謂「南京事件」是戰勝的盟軍集團裡美、中等國在東京審判時所羅織出來的罪名，整個事件是個虛構，日本人非但不是加害者，反而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sup>33</sup>

在戰爭的悲慘程度與受害者意識方面，首先，作為「受害者」最

---

33 中文所稱的「南京大屠殺」，日文一般以「南京大虐殺」來稱呼，而右翼民族主義者則僅稱之為「南京事件」，因為他們主張「虐殺」的事實並不存在。更極端一點的（如小林善紀）甚至連「南京事件」這樣的詞都不願使用，因為他們認為整個「事件」是一場虛構，既然是虛構，也就沒有「事件」可言。在日本，「南京事件否定說」儼然成為一個學術（或半學術）事業，許多研究者花了無數時間與精力，目的僅是為了證明所謂「南京事件」是一場虛構，除了考證數據以否認日軍進入南京城曾進行屠殺外，另外一種常見的否定方式，是論證那些被當作證據的照片都是合成造假，例如人物的表情不自然、日光照射陰影角度不對、背景可疑、照片不可能為真，等等。小林善紀在漫畫中所呈現的，大抵只不過是把這些論證重新整理，以圖像的方式來表達而已。此點將於下文詳論。

令人念念不忘的是，日本乃「人類史上唯一遭受過原子彈浩劫」的民族。從右派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原子彈之所以落在日本而不是別的地方（例如同為軸心國的德國），純然是因為美國對日本的人種歧視，等於是把日本人當成原子彈爆炸的「人體實驗」對象。小林善紀更強調，西洋人沒把日本人（東洋人）當人看，頂多只是猴子，因此美軍把原子彈投擲在日本，也不過只是因為沒把日本人當人看，而是當成動物一般做實驗（小林善紀 1998: 142, 337）。

關於原爆問題，儘管今日官方的表面說詞是認為日本因過去曾犯下錯誤而招致悲劇、今後應努力確保和平不讓悲劇重演，但在很多民族主義者看來，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曾經遭受過如此嚴厲的懲罰。換句話說，無論戰爭責任誰屬，日本國民在戰爭上面所蒙受的損失（或懲罰）是其他國家所難以比況的。而如果要算起戰爭的帳，日本最常被追究的便是惡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殺。然而，民族主義者的反駁策略，除了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確性之外，另一個常見的說詞，便是強調日本在原子彈轟炸與東京大空襲當中所蒙受的損失，並不比南京大屠殺來得小。東京大空襲與原子彈轟炸，同樣都是針對非特定目標、將平民百姓與戰鬥員一視同仁的「無差別性爆擊」，尤其兩次轟炸所投下的燒夷彈與原子彈都具有極其致命的破壞力與殺傷力，其性質與焚城屠殺無異。小林善紀便把東京大空襲稱為「人類史上空前的戰爭犯罪、大屠殺」，而原子彈更是「惡魔的行徑」（小林善紀 1998: 324-325, 338）。如果日軍在南京屠殺平民百姓應該被追究的話，那麼盟軍（美軍）在東京與廣島、長崎等地針對平民百姓所進行接近焚城屠殺的行為同樣也極為殘忍，應該加以追究。<sup>34</sup>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戰敗的日本被置於審判台前成為戰犯，而戰勝的美國非但毫無責任，反而還以高高在上之姿，以指導者的身分為日本戰後

---

34 知名的左派歷史學者家永三郎在其《戰爭責任》一書中，除了檢討日本的戰爭責任外，也指出美國必須為東京大空襲與原爆所造成的無差別殺害負起責任（家永三郎 1985: 315-32）。很顯然地，追究美國的戰爭責任並非只有右派民族主義者，左派也不乏其人。然而，在政治現實上，的確很少人像要求日本謝罪一樣要求美國要對其戰爭責任謝罪，這也是造成右派極度不滿的原因之一。

的政治與社會發展擘畫藍圖。換言之，無論作為加害者或被害者，日本比起其他國家都存在著更大的「（處境或待遇）劣於他人」的不平等，這自然更加深了怨恨心態的產生。

日本戰後民族主義的言論常被等同於「軍國主義復甦」，對於這樣的指控，小林等人更是心懷不滿，認為自己蒙了不白之冤。日本周邊被擁有核武的蘇聯／俄羅斯、北韓與中國所環繞，日本有著一部明言放棄戰爭、否認交戰權的憲法，即使擁有自衛隊都被人質疑違憲，這樣連自衛隊都有困難的「不正常國家」，居然被軍力不斷擴張的中國指責為軍國主義，在小林等人看來，實在是荒唐無稽，甚至覺得衆人是非顛倒，為自己叫屈不已（小林善紀 2001: 52）。

另一方面，右派對於和平憲法與其所衍生之和平主義教育，也同樣無法接受。當今國際政治仍是現實主義當道，軍力被視為是國力的一部份，要日本不保有武力且放棄交戰權，不僅使其成為「非正常國家」，也使得日本在國防上必須仰賴美國而成其附庸。儘管當前的自衛隊雖無軍隊之名卻已有軍隊之實，而波斯灣戰爭後自衛隊的海外派遣也已經實質違背日本憲法的精神，但由於和平憲法與和平教育的存在，使得軍隊隱隱然被污名化，而「保家衛國」似乎也成了無法說出口的禁忌。小林善紀乃將「和平主義教育」稱為「洗腦的教育」，指責日本大眾受洗腦教育毫無自覺，至死不悟（小林善紀 1998: 194）。濤川榮太在「創作會」的座談會上也指稱：

這種高貴的[保衛家園]義務，在這個國家已經消失無蹤了。……若問這個國家的年輕人「被他國侵略時該怎麼辦？」百分之十的人回答「保衛之」，百分之九十的人回答「不戰而逃」。世界的年輕人們百分之七十以上會回答「保衛之」。若問「為了幫助自己的國家，犧牲自己的利益也沒關係」，回答「是」的人美國有 56.9%，韓國有 54.4%，而日本居然只有 5.5%。這個數字，顯示了這個國家結構的心理深層。戰後五十年來的日本人除了經濟以外對於人類生活的各種樣貌

漠不關心，這種愚癡已經走到了國家存亡臨界點的時候了。  
就像迦太基末期一樣。（濤川榮太 1997: 192-193）

我們姑且不論上面的民調數字從何而來、是否可靠，僅從這段文字來看，「創作會」的成員有一種「危機感」，覺得國家的存亡絕續岌岌可危，認為自己的國家不如人，是個沒有人願意犧牲效命的「非正常國家」。筆者在此並非要提倡「為國效命」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而是要指出，這種「為國效力」的凡常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已經成為當今國族現實(nationalist reality)的一部份，日本相對於這種「凡常民族主義」反而顯得反常。<sup>35</sup> 例如小林善紀便認為自己只不過說出「公民要保衛祖國」，這樣的論點在世界其他國家其實極為稀鬆平常，在日本卻被視為毒蛇猛獸，眾人避之唯恐不及。與其他國家之「愛國心」相較，日本人普遍缺乏愛國心，乃異常之例外，而這一切又被歸咎到和平憲法與和平主義教育（小林善紀 1998: 374）。

右派所感受到的「危機感」不只是針對一般民衆「缺乏愛國心」而發，還包括對於共同體意識薄弱、歷史意識斷裂，乃至道德崩壞、價值解體的危機感。小林的《戰爭論》的論理方式，並不是從一開始就美化戰爭，而是從日本當前「和平主義」的思想氣氛開始談起，針對提倡「人權」、「自由」、「個人」、「反戰和平」等價值理念的「殘存左翼」、「左派公民團體」與「戰後民主主義者」等大加撻伐，認為他們是造成今日日本社會價值崩壞、集體意識淡薄、個人物慾橫流的元兇。<sup>36</sup> 為了喚起年輕人的集體意識，小林才開始轉向戰爭

35 關於凡常民族主義，見 Billig (1995)；關於國族現實，見 Wang (2004)。

36 在小林的語彙裡，直接受到馬克斯主義影響的人，他以漢字「左翼」來表示，至於沒有直接受到馬克斯主義影響、僅是無意識地被「人權」等價值牽著走而具有反權力、反國家、公民主義傾向的人，他以片假名「サヨク」來稱呼（小林善紀 1998: 24）。由於今日直接受到馬克斯主義啟發影響的所謂「殘存左翼」已經不多，小林主要的批評對象，乃是以無意識的「サヨク」為主。由於中文無片假名，本文將後者以「左派」翻譯之，以避免與日語漢字的「左翼」（發音也是「サヨク」）相混淆。讀者必須留意小林用「サヨク」（左派）指稱的是一般的「戰後民主主義者」，而不僅限於狹義的左派馬克斯主義者。一般提倡自由主義與民主理念的人常被歸為「右派」，但在日

的話題，為年輕人講述「偉大壯闊的大東亞戰爭」，而聖化戰爭、美化戰爭的工作，也由此展開。《戰爭論》中對大東亞戰爭的合理化方式，和傳統右翼乃至皇國史觀的看法並沒有什麼差異，與大日本帝國合理化戰爭的說詞如出一轍，僅是重述一些陳腔濫調（例如日本發動戰爭，乃是為了突破「ABCD包圍圈」，與白種人對抗，將亞洲從歐美的殖民勢力中解放出來；進軍中國有不得不然的苦衷、稱不上是侵略，云云）。也正是因為如此，許多批評者認為這波新民族主義的熱潮其實是日本戰前軍國主義的借屍還魂。但是和過去有所不同的是，這些聖化戰爭、美化戰爭的說詞，並非僅僅重複戰前軍國主義的論調，而是針對日本當前的社會脈絡有感而發的。小林認為，大東亞共榮圈而戰死的祖父輩們乃是為了信念光榮而死的英雄，值得成為神來加以祭拜；反觀當前日本社會，「少年殺人、少女賣春」，價值迷亂，集體意識喪失，在此背景下，「難道這個國家不需要一些類似像大東亞共榮圈這樣的神話故事嗎？」（小林善紀 1998: 296-297）不滿戰後教科書對這段歷史的漠視乃至否定評價，小林振振有詞地說：「為了所愛的人、為了國家而戰的祖父世代，對於他們的勇氣，至少應該表示一點感謝與尊敬吧！」（小林善紀 1998: 377）

韓裔評論家姜尙中(2001)曾一針見血指出，小林善紀的愛國主義其實帶有一種對斷裂歷史的鄉愁與懷舊。藉由鄉愁與懷舊，小林強調自我犧牲、英雄與神話，藉以凸顯日本當代社會「公共心」與共同體意識的缺乏（小林善紀 1998: 344-349）。<sup>37</sup> 這種對共同體意識模糊、道德價值喪失的危機感，也普遍見於「創作會」的其他成員。如濤川

---

本特殊的政治脈絡裡，民主主義者卻常被視為「左派」；日本的「左／右」區分之扭曲複雜，由此可見一斑。

37 值得一提的是，小林善紀(2000)在《台灣論》中感慨，「失落的日本精神在台灣找不到」，其實有其結構因素。所謂「失落的日本精神」，不外是大日本帝國在大東亞戰爭期間所鼓吹的滅私奉公、效忠天皇、忠君愛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等精神，這些價值在戰後不但不再被提倡，甚且因為美軍的言論管制而成為禁忌。在台灣，皇民化思想雖然也是戰後接收政權的國民政府所亟欲剷除滌清的對象，但國民政府所提倡的中國民族主義教化，其實也保留了許多忠孝節義、捨己為群、犧牲奉獻、成仁取義、忠黨愛國的理念與思想，無論結構或內容都與大日本帝國鼓吹的皇民化思想有高度的相似性，只是效忠的對象從日本國族（萬世一系的天皇）改為中華國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而已。

榮太（1997: 192-193）便感慨：「孝敬奉養、忠義、勤勉、節約、忍耐、勇氣、正義感、犧牲心、尊嚴、信義。這個國家勤勤懇懇地在歷史中所造就的這些國民美德，現在正逐漸消失中。」事實上，除了《國民的歷史》外，「創作會」還編纂了一系列以「國民」為題的叢書，包括《國民的道德》、《國民的教育》、《國民的藝術》、《國民的思想》、《國民的文明史》等，洋洋灑灑，幾乎可以說是一項全面性的「道德共同體重整運動」。借用 Benedict Anderson (1991)的話來說，日本當前民族主義所從事的不僅僅是「歷史修正主義」，而是透過各種論述行動來解決其存在的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

民族主義被當成解決存在焦慮的「擬似宗教」(quasi-religion)，普遍見於世界許多民族主義的案例中，但在怨恨者身上，這種存在的焦慮感又更深一層。怨恨者有兩種看似矛盾的特質，一方面是喜歡不斷地與他人比較，一方面是近乎盲目的自我肯定與唯我獨尊，這兩者都與缺乏自我定位的信心有關。由於無法認清自我在價值體系中的位置，或是無法接受自己不如人的事實，怨恨者必須強調自己位於價值的優位，才能肯定自我的存在。誠如舍勒所指出，怨恨所累積的心理能量，長期下來將導致「價值位移」或「價值顛覆」；我們在怨恨者身上經常可以觀察到一種近乎盲目的自我肯定，可說是長期怨恨導致價值位移的結果。<sup>38</sup> 在此，小林自創的「傲慢主義」是很好的例證。《戰爭論》和幾年前在台灣造成風暴的《台灣論》一樣，其實都是作者自稱「新傲慢主義宣言」（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的系列作品。所謂「傲慢主義」乃是作者自造新語，取日語的「傲慢」（ごうまん）結合外來語「主義」（ズム，英語之 ism 之意）而成。<sup>39</sup> 在這一系列漫畫中，小林在每一章最後的標準台詞是：「傲慢一下總可以吧？」小林另外創辦了名為《わしズム》的右派雜誌，中文差堪譯為

38 所謂「價值位移」指的是移動事物在價值圖表上的位置，使得高價值之物成為低價值之物；而「價值顛覆」則是指將整個價值圖表頭下腳上顛倒過來，使得高的價值變成低的，低的價值變成高的。參見 Scheler (1998: 52-61)。

39 有趣的是，在台灣出版的《台灣論》漢譯本，則將「傲慢主義」翻譯成「傲骨精神」，似乎有意無意影射台灣民族主義者不畏中國打壓的「傲骨」。

「老子主義」，和自創「精神勝利法」、永遠「自我感覺良好」的阿Q頗有異曲同工之妙。<sup>40</sup> 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推到極致，便是一種不知反省的唯我獨尊。當今日本有不少立場保守的暢銷書，大力推崇日本文明、甚至認為唯有日本才能拯救當今世界文明的危機，聽起來似曾相識，和大東亞戰爭時期的官方宣傳類似，系譜上也可以追溯其關連，唯一不同的只是避免使用過份刺激的話語而已。類似的「日本救世論」為何一再出現，而且還能在近年大行其道，這背後其實反映了某種潛藏的感情結構，而這種感情結構，我們可以從右派民族主義者的言論中找到端倪。

最後，日本當代新民族主義的怨恨，還反映在對「鄰近國家對日怨恨」的怨恨上，我們或許可稱之為「東亞怨恨的重層結構」。<sup>41</sup> 在戰後的中國與韓國民族主義論述中，都不免將日本當成「負面他者」來加以描繪，「反日」、「仇日」的情緒時有所聞。這種趨勢，到了1990年代以後更加明顯。<sup>42</sup> 作為被「仇恨」、「怨恨」的對象，日本的右派民族主義者更是覺得難以忍受。例如小林善紀在《戰爭論》中便一再抨擊中國與韓國不斷利用「反日」、「仇日」的情緒來推行愛國主義教育，而日本卻子子孫孫都要成為不斷道歉謝罪的罪人（小林

40 「わし」是日文中一種粗俗的自稱方式，在某些脈絡下，大致可與漢語的「老子」或台語的「恁爸」相當，意在貶抑對方、抬高自我。大喇喇地自稱「老子」、「恁爸」且冠以「主義」之名，擺明了是不以粗陋為意、反而引為自豪，和阿Q的「精神勝利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阿Q打不過閩人，被痛扁一頓之後，心裡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因為以老子自居，所以儘管打輸了也自認勝利，沾沾自喜地離去。阿Q是魯迅筆下活靈活現的知名人物，他許多荒誕突梯的事蹟，其實可說是怨恨心態的反映。江日新(1999)對此曾有深入的析論。此處必須要特別留意的是，精神勝利法讓人表面上看起來自信滿滿、自鳴得意，但正是這些「過剩的自信」，使我們得以看出怨恨者的缺乏自信與對自我肯定的渴求。

41 感謝審查人之一點出此一面向。

42 中國與韓國的對日怨恨，是值得另外研究的問題，此處無法全部處理。這裡僅要提出一點說明：依照舍勒的理論，勝利者或報復衝動已經獲得滿足的人，是不會出現怨恨的。中國作為戰勝國，按理說不必對日本怨恨，但由於冷戰結構與兩岸政權分立，使得中日和約的簽訂、戰爭損失的賠償與戰後關係的修補一直無法順利解決，而日方對於南京大屠殺、731部隊、慰安婦等問題的處理態度也無法讓中方滿意，因此，我們很難說中方僅僅因為身為戰勝國，其報復衝動即已獲得滿足（更何況日本一直認為自己是被美國而非被中國打敗）。此外，直到199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戰後東亞的經濟大國，這樣的地位再加上過去歷史的糾葛，使得日本很容易成為東亞鄰近諸國美好怨恨的對象。

善紀 1998: 123)。尤有甚者，日本政府在教科書審查上有所謂「近鄰諸國條項」，亦即日本的教科書內容，必須考慮鄰近各國的感受。<sup>43</sup>這項條款更加引發右派民族主義者的不滿。藤岡信勝在一場罕見的左右交鋒的座談會上呼籲「不可臣服於近鄰諸國的壓力」，指稱現行教科書是「國籍不明的教科書」，非但無法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反而處處屈從壓力團體的要求，而這些壓力團體，說穿了，其實就是外國。<sup>44</sup>從右派民族主義者的眼光來看，相對於日本的「近鄰諸國條項」，中、韓等近鄰諸國非但沒有類似的條項考慮日本的感受，甚且在教科書與大眾媒體中公然進行反日、仇日的宣傳，完全不必受到批判束縛，實乃不公平之事。因此，這波新民族主義論述中，也同時出現了對中、韓兩國的嫌惡攻訐，形成了所謂「嫌中流」、「嫌韓流」。例如井澤元彥與金文學(2005)提出「逆檢定」的說法，要反過頭來審查中國的教科書，檢視其反日、仇日的內容；而水谷尚子(2005)也以《解剖反日》為名，批評了中國愛國主義教育中的反日情緒與大眾媒體的反日文化；右派漫畫家山野車輪自 2005 年開始出版一系列題為《嫌韓流》(2005)、《嫌中國流》(2008)的漫畫，也一度造成話題。<sup>45</sup>在此，我們再度看到怨恨者的「價值攀比」，且攀比的是仇恨、憎惡等負面價值；而怨恨的對象，也從美國擴大到了中國與韓國。這種「建立在他人怨恨上的怨恨」，重重交疊所形成的「東亞怨恨的重層結構」，透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反饋機制與迴路，使得怨恨不斷被加強擴大，乃至相互煽風點火，而東亞各國之間的心結也更加難解。在這

43 「近鄰諸國條項」的起源，在於 1982 年日本電視台記者報導日本文部省在教科書審查時要求高中歷史教科書必須把日本對中國華北的「侵略」改為「進出」，引發中、韓等國抗議而衍生外交風波，因此文部省後來在《教科書審定基準》中增加了一條新的規定，要求有關近鄰亞細亞諸國間的近現代史的記述，必須要考量到國際理解與國際協調的立場。該條文因此被稱為「近鄰諸國條項」。

44 參見サンデー毎日(2001: 140, 146)。如前所述，在這波新民族主義論戰中，左、右雙方的學者專家都辦過無數次的座談會、出版難以數計的專書與論文，但大都僅止於各說各話或是相互叫陣，少有直接交鋒。這場座談會請來了左右雙方的代表學者直接對話（左派為姜尚中與小森陽一，右派為藤岡信勝與坂本多加雄），雙方唇槍舌劍激烈交鋒，可說絕無僅有，非常具有代表性。感謝牛村圭教授提示資料。

45 「嫌中流」與「嫌韓流」另有各自的時代背景與結構脈絡，包括中國的快速崛起、韓國的文化產業（電視劇、電影、電玩、流行歌曲等）大量輸出「韓流」所造成的反彈等，此處限於篇幅，只能點到為止，無法再一一細論。

種重層怨恨的結構下，不那麼怨恨日本、甚至經常表現出「親日」、「哈日」的台灣，成為日本右派民族主義者想要拉攏結盟的對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 四、結語：解開東亞怨恨的重層結構

本文從制度論的觀點出發，主張不應把日本當成一個具有高度同質血緣與文化的民族國家，而應考察日本國族是由哪些制度所形塑。戰後日本的國族建構深深受到美國對日戰後體制改革的制約與影響，尤其「和平憲法」與所謂「東京裁判史觀」這兩項制度遺緒，在日本社會埋下了怨恨的種子。透過本文的現象學考察，我們發現：1990年代以來出現的新民族主義論述充斥著負面情緒與負面訴求，很大一部份是針對前述兩項制度遺緒而發；這些論述被揉雜著反覆咀嚼的「報復衝動」與「無能意識」的怨恨心態所浸透，致使民族主義者產生種種價值扭曲，無法公正地評價自己與評價他人，歷史修正主義也就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在分析的過程中，本文也逐步揭示了一個或可稱為「重層怨恨」的情感結構，存在於東亞社會之間，值得進一步析論。

作為發動戰爭、造成難以數計的人員死傷與慘重損失的侵略國，日本作為一個集體的確需要負起各種責任，為其犯行接受懲罰並痛加反省、避免重蹈覆轍，這是絕對無庸置疑的，也是本文的前提。然而，如果這些懲罰的過程未能符合正義、如果反省與改造不是出自內心，那麼這些懲罰、反省與改造恐怕都將留下其他的後遺症，甚至造成更大的反作用力，而這也正是我們在戰後日本所目睹的現狀。正如日本戰後的民主革命被稱為是（美軍所帶來的）「從上而下」而非「從下而上」的革命，日本戰後的反省也是「由外而內」而非「由內而外」的反省，是在他者的誘導乃至「逼迫」之下而產生，這樣的反省並不是「反求諸己」的反省；更重要的是，逼著日本人反省就範的不是別人，而是當初發動大東亞戰爭所一意要打敗的白種敵人——美

國。正如 Dower (1999)所形容，美軍在占領時期的所作所為，正是要讓日本人「擁抱敗北」(embracing defeat)。在這個生吞活剝、擁抱敗北的過程中，人們不但被迫與過去一刀兩斷，更要徹底否定過去的自我、擁抱敵人的價值觀。如果戰後台灣人民從「學做日本人」轉而「學做中國人」曾經有過一段集體創傷的記憶，那麼日本在美軍占領時期所經歷的，同樣也留下許多創傷與後遺症。台灣人面對不同的祖國座標，在幻滅的過程中摸索自我；<sup>46</sup> 日本人則是徹底否定過去的自我，但新的自我在哪裡卻還不確定，而是由戰勝者以指導者之尊所決定。儘管指導者一開始是以「正義」與「文明」之名對戰敗者進行改造，但從事後的發展來看，這個過程充滿太多戰勝者的便宜算計與利益權謀，而制度改革的不徹底，造成日本戰前與戰後體制藕斷絲連，這些因素都使得許多日本人難以真心服輸，也無法深刻反省。

本文在一開始指出，許多評論者在批判這波民族主義熱潮時，經常有意無意流露出輕蔑的態度。對很多人來說，這些「幼稚的民族主義想法」只不過是「滿紙荒唐言」，批評者大多急於反駁其論點，但卻未必能指出這些「荒唐言」是怎麼來的。其實這些民族主義者很多算不上是「右翼軍國主義者」，他們能夠博取廣大讀者群的共鳴也不是沒有社會基礎，如果僅是將之斥為邪說謬論而不屑一顧，我們非但失去了理解日本民族主義心理的一個契機，同時也無法阻止其繼續瀰漫擴大，甚至在動員群眾心理上產生影響。這些民族主義的論述也許缺乏深刻的內容，有些甚至顯得粗俗，但其體現的意義卻不容我們小覷。孫歌在批判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一書時曾指出：

無論在意識形態立場和學理上還是在資料使用方式上，該書的弊端都是極其明顯的；但恰恰是這樣一本為進步菁英不屑一讀的書，卻反襯出日本知識份子批判立場所面對的困境：

---

46 若林正文(1987)分析台灣的抗日運動，發現除了意識形態的左右對立外，還參雜了「中國座標」和「台灣座標」的分歧；吳叡人(1994)分析台灣戰後初期的台獨運動，也發現其中存在著「三個祖國」的交錯。

這本書意味著對於「近代的超克」以來日本知識界圍繞近代衝擊進行的思想建設的全面反動，那個被竹內好稱之為「困境」的日本主體建構的問題，被徹底消解在「有聲的不服從」之中了。<sup>47</sup>《國民的歷史》以最為單純的方式重新整合了一直受到嚴厲批判和解構的日本想像，而其基礎卻是二戰中日本人的創傷經驗和對於日本民族的英雄主義書寫。訴諸於這些被否定了的記憶，《國民的歷史》試圖重新塑造日本人的「日常經驗」，這也意味著進步知識人使用西方思想資源批判日本民族主義工作的有效性受到質疑。（孫歌 2005: 213-214，底線為筆者所加）

孫歌的這段話，的確指出「進步菁英／知識人」的一些盲點。「進步知識人」在批駁右派言論的時候，常流露出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對於這些言論的廣為流佈感到極度焦慮，另一方面卻又認為右派（如小林善紀者流）層次太低，不值一駁，因此要極力貶低其地位與人格。時任東京都立大學教授的宮台真司便說，小林善紀等人將戰爭正當化的議論，其實只不過是無知的表現，連論爭的價值都沒有。宮台甚至以一副師長的姿態說，自己頂多是在閒暇之餘給對方一點諄諄教誨，畢竟對方只是個「半大人」的小孩（宮台真司 1999: 13）。但這些批評正好中了小林的下懷，使他得以在《戰爭論》第二部、第三部（小林善紀 2001, 2003）當中繼續揶揄知識人，認為這些自詡進步的菁英不敢也沒有能力在知識上和他論辯，只能做一些不入流的人身攻擊。小林甚至以引起眾人圍剿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在日本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戰爭論》第三部當中便有一段狂想曲，小林幻想美國總統布希因為不滿小林言論在日本擴散而決定終止美日安保條約，結果引發日本社會動盪騷亂乃至解體，而小林則洋洋自得，認為

---

47 筆者按：此處所謂的「困境」，主要是指「圍繞著東亞近代化過程所發生的日本何去何從的問題」；竹內好察覺到，「建立新的東西二元對立模式不可能解決日本何去何從這一難題」。進一步討論請參見孫歌(2005: 196-197)。

自己在日本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這段極端自我膨脹的「妄想」，更可以窺見小林等人心中所隱藏的怨恨心態與（報復）慾望，頗有阿Q「精神勝利法」的味道。尼采關於怨恨者的一段話，恰恰可以作為這段狂想曲的註腳：「他們不能通過採取行動做出直接的反應，而只能以一種想像中的報復得到補償。」<sup>48</sup> 從思想批判的角度來看，小林的著作的確沒有什麼深刻的理論或嚴謹的思考，充其量只是把很多學者（或半學者）的論著重新以漫畫的方式重現一遍，然而它所造成的效應卻是使這些學術或半學術的著作的論點得以透過小林的漫畫傳播擴散，從而獲得廣大庶民情感的迴響。從這點來看，重點不應該只是去批駁其中的論點，而更應該理解裡面所表達傳遞的是什麼樣的情感與價值觀。

宮台真司(1999: 14)在批判《戰爭論》時也曾指出，小林的論調其實是弱者怨恨心態的展現。然而，宮台的目的只是為了要貶低對方的地位，對於怨恨心態如何產生、發生什麼樣的效果，則完全未加著墨。這種論理方式，其實也反映出某種（傲慢的）價值觀與高傲姿態，彷彿只要把對方貶為心懷怨恨的弱者，就可以達到打倒對手的目的，事情也就結束了。問題是，如果怨恨的確是扭曲的史觀與價值觀的來源，那麼指出對方的怨恨，只是問題的開始，而不是結束；而如果對方的確是弱者，那麼更應該設法去理解乃至改變弱者的處境，而不是加以貶抑即棄之不顧。重點不在於以一種高高在上的道德姿態來把對方貶低為「半大人」的「弱者」，而在於共感式地理解這些「錯得離譜」的信念是如何而來。更重要的是，醞釀這些「錯誤信念」的怨恨心態，不只見於作為他者的日本，也同樣存在我們自身；而導致怨恨心態的社會情境，其實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曾經歷過。如果我們不能移情式地(empathetically)理解這些想法的來龍去脈，只是一味地將對方視為喪心病狂或別有居心的軍國主義者，我們不但可能錯失相互對話、和解的契機，也可能重蹈覆轍而不自知。

---

48 原文出自《道德的系譜學》，此處轉引自江日新(1999: 15)。

在評論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被遺忘的一九三七》時，陳芳明(2007)曾說過下面一段話：

彰顯獨一無二的歷史記憶，其實就是在遮蔽不同族群的歷史經驗。……每一個個人的歷史記憶，都是無可取代；每一個族群的文化鄉愁，也是無可輕侮。以草率、輕率方式任意壓制或消除記憶的差異，絕對不可能建立普遍的政治認同，反而會創造更多文化衝突。

上面這段話是針對台灣過去的歷史記憶，從被壓抑的「二二八記憶」到被壓抑的「外省人記憶」而說的。讀了這段充滿感性的文字，大概很少人會聯想到日本右翼或保守派，也很少人會用這樣的觀點來理解日本的新民族主義。筆者並非要為民族主義的言論開脫，但如果把時空置換一下，用這段文字來理解占領時期日本社會所經歷的種種事情，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大東亞共榮」的思想打死不退，為什麼許多日本人覺得無須謝罪道歉，甚至覺得自己才是受害者。美國的占領當局以極為粗暴的方式將關於二次大戰的歷史定於一尊，要日本人接受，並全面抹煞戰前的記憶、否定日本人戰前的想法。這樣做的代價，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的興起。

陳芳明的這段發言格外值得參照，在於其發言位置與脈絡。陳芳明早年曾是台獨理論健將，批判國民黨政權與大中華沙文主義不遺餘力，同時也致力構築台灣本土文化認同。但是隨著時空移轉，當本土化凌駕一切，乃至壓迫到外省族群（一度被污名化、與「外來政權」劃上等號）的歷史記憶時，陳芳明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為維護外省族群的歷史記憶說話。同樣地，日本在歷史上曾經作為侵略國、加害者，這些事實都不容否認，也值得持續反省批判；但作為戰敗國，它的集體記憶與情感也曾受過無比的暴力斷傷，這個事實也必須加以正視。如果無法正視這個事實，那麼怨恨之結恐怕永難解開。

也許有人認為，日本是毫無疑問的侵略者、加害者，面對錯誤、反省道歉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侵略者與加害者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鄉愁」（借用陳芳明與姜尙中的話來說）也必須加以正視；如果粗暴對待，恐將適得其反。正如台灣人被否定的殖民經驗與創傷記憶助長了戰後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日本近現代歷史中被否定的情感與記憶，如今也成了滋養民族主義的最佳溫床。<sup>49</sup>

在評論《戰爭論》時，姜尙中也曾針對小林善紀說了如下一番話：

我認為小林這個男人，其實是個膽小怕事的「鄉下人」。就「鄉下人」這點來說我和他是共通的，不會因世代而有什麼差別，因此他的心理我很能夠理解。可以說，「鄉下人」的素樸的愛國主義被國家理性所回收，而他只是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小丑般的角色。這樣的光景在戰前也很常見，不是嗎？  
（姜尙中 2001: 280）

雖然姜尙中不免也把小林貶抑成「膽小怕事」的「小丑」，但和宮台眞司不同的是，他從自己同為「鄉下人」的立場，指出這種「素樸的感情」很容易被國家回收利用。正如台灣的族群問題很容易被政治人物煽動挑撥，我們不能否認這些感情與情緒的存在，而解決之道也不是去壓抑它們、否定它們，而是必須去瞭解與疏通。宮台眞司(1999: 14)認為要以「真理的邏輯」來代替「感情的邏輯」，但這恰恰是問題之所在。根據舍勒，現代性的問題恰恰是感情的邏輯完全遭受壓抑所致。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更顯出舍勒對現代性批判的犀利洞見與深邃力道。<sup>50</sup>

49 有關日本戰爭記憶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進一步討論，可參見 Seraphim (2006)、Orr (2001)。

50 舍勒關於現代性的批判，除了本文所討論的怨恨心態外，另外必須結合他有關「情感先天性」(emotional a priori)的主體性理論以及「非形式主義」(non-formalism)的價值理論來看，才容易理解。參見 Scheler (1973, 1998)，中文學界的闡釋可見江日新(1990)、劉小楓(1994)。

最後，筆者還是要強調，本文並不是嘗試為日本民族主義者開脫，也不是認為過去的犯行不需被清算究責。筆者只是要指出，歷史現實的圖像往往比我們原來想像的來得複雜許多，而「東亞怨恨的重層結構」則使得問題更加複雜難解。近年來已經有多位學者從不同地域角度檢討後冷戰的東亞秩序，並嘗試區域和解對話的可能性，但他們均不約而同地發現，二戰所遺留的戰後處理問題因冷戰結構而被凍結、又因冷戰的多重結構而使問題更加複雜化。他們也同時發現，東亞各地區的學者之間即使在表面上看來可以彼此理性溝通，但「情感」卻是難以跨越的鴻溝。<sup>51</sup> 本文所做的，亦只是嘗試去揭露這個「怨恨的重層結構」的一部份，並分析其背後所衍生的情感與價值觀的問題。如果「溝通」與「和解」還有可能的話，那麼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暫時放下自己的感情，嘗試理解對方的感情與感受。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懷抱著不共戴天的國仇家恨來看事情，那麼即使溝通也成為不可能，和解也就更加遙遙難期了。

誌謝：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週五論壇、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以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社員例會等，筆者感謝所有與會者提出的回饋意見。由於人數頗多，為恐掛一漏萬，恕不逐一列名誌謝。范雲、陳緯華、林泉忠等人曾閱讀本文初稿並提供修改意見，助理張蕙蘭、馮瓊瑩、周德望、魏柏（Scott Wilbur）等人在資料蒐集與文稿整理的協助，在此一併申謝。筆者赴日蒐集資料期間，曾接受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日文研）獎助；筆者由衷感謝在日文研訪問期間所得到的支持贊助，尤其牛村圭教授花了不少時間與筆者討論並提供重要資料，劉建輝、松田利彥、瀧井一博、Jim Baxter、金榮哲、陳姪媛等人在不同議題上曾給予筆者許多啟發協助，點滴銘感於心，不在話下。另外，筆者要特別感謝已故的園田英弘教授(1947-2007)，如果不是他的慷慨贊助，本研究大概不可能完成。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台灣社會學》編委會對本文初稿提出許多切要的批評與建議，筆者獲益良多，由衷感謝。最後要感謝謝麗玲小姐在編輯事務上的耐心與細心。本文同時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97-2410-H-001-045-MY3)之部分研究成果。

---

51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見孫歌等(2006)、孫歌(2002)等。

## 參考文獻

### 中文

- 王向遠(2005)日本右翼言論批判："皇國史觀"與免罪情節的病理剖析。北京：崑崙。
- 田桓(1990)日本戰後體制改革。北京：經濟科學。
- 白永瑞(2006)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思想 3: 129-150。
- 江日新(1990)馬克斯·謝勒。台北：東大圖書。
- (1999)阿Q之怒：失序的價值重估與自我毒化的自欺。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15: 155-198。
- 步平、王希亮(2005)日本右翼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汪宏倫(2001)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 1: 183-239。
- (2006)怨恨的共同體。思想 1: 17-47。
- 吳叡人(1994)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國家認同的競爭與形成，1945-1949。台灣政治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台北：台灣政治學會。
- 前衛編輯部編 (2001)台灣論風暴。台北：前衛。
- 若林正丈(1987)台灣抗日運動中的「中國座標」與「台灣座標」。當代 17: 40-51。
- 孫歌(2002)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的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2005)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海鵬、步平主編(2002)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陳光興(2006)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
- 陳光興、李朝津編(2005)反思臺灣論：台日批判圈的內部對話。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陳芳明(2007)「被遺忘的 1937」共同台灣 不同記憶。中國時報，11 月 28 日。
- 黃自進(2004)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的個案探討。東北亞研究論文系列 20。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劉小楓(1994)怨恨社會學與現代性。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4: 128-152。
- (1996)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 日文
- 赤澤史朗(1994)戰後思想と文化。見中村政則編，占領と戰後改革。頁 174-195。

- 東京：吉川弘文館。
- 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編(1997)新しい日本の歴史が始まる：「自虐史観」を超えて。東京：幻冬舎。
- 阿部潔(2001)彷徨え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ー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ジャパン/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京都：世界思想社。
- 天野恵一(1997)「自由主義史観」を解説する。東京：社会評論社。
- 家永三郎(1985)戦争責任。東京：岩波書店。
- 井沢元彦、金文学(2005)逆検定：中国国定教科書。東京：祥伝社。
- 井尻千男(1997)被占領下の七年間に何があったか。見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編，新しい日本の歴史が始まる，頁 24-29。東京：幻冬舎。
- ウンダーリック (Wunderlich, Herbert J.) (1998)占領下日本の教科書改革。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
- 江藤淳(1994[1979])忘れたことと忘れさせられたこと。東京：文藝春秋。
- (1994[1989])閉された言語空間：占領軍の検閲と戦後日本。東京：文藝春秋。
- 王智新、趙軍、朱建榮(2001)「つくる会」の歴史教科書を斬る：在日中国人学者の視点から。川口：日本僑報社。
- 小熊英二(1995)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 小熊英二、上野陽子(2003)「癒し」のナショナリズム：草の根保守運動の実証研究。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 小沢一郎(1993)日本改造計画。東京：講談社。
- 大日方純夫、山科三郎、山田朗、石山久男(1999)君たちは戦争で死ぬるか：小林よしのり『戦争論』批判。東京：大月書店。
- 加藤典洋(1997)敗戦後論。東京：講談社。
- 茅島篤(2000)国字ローマ字化の研究：占領下日本の国内的・国際的要因の解明。東京：風間書房。
- 姜尙中(2001)東アジアの広がりの中から、『台湾論』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考える。見東アジア文史哲ネットワーク編，〈小林よしのり『台湾論』〉を超えて，頁 270-280。東京：作品社。
- 小林よしのり (小林善紀) (1998)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戦争論。東京：幻冬舎。
- (2000)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 special：台湾論 (中譯：《台湾論：新傲骨精神》，頼青松、蕭志强譯，台北：前衛，2001)。東京：小学館。
- (2001)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 special：戦争論(2)。東京：幻冬舎。

- (2003)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 special: 戦争論(3)。東京: 幻冬舎。
- 小森陽一、高橋哲哉編(1998)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 小森陽一、坂本義和、安丸良夫編(2001)歴史教科書何が問題か: 徹底検証 Q&A。東京: 岩波書店。
- 小山常実(2001)歴史教科書の歴史。東京: 草思社。
- サンデー毎日(2001)「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のどこが問題なのか。6月24日, 頁140-150。
- 孫歌、白永瑞、陳光興編(2006)ポスト「東アジア」。東京: 作品社。
- 高橋哲哉(2005)戦後責任論。東京: 講談社。
- 田中英道(2002)まとめて反論: 「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の思想。東京: 扶桑社。
- 俵義文(2000)終章「つくる会」の運動と『国民の歴史』。見「教科書に眞実と自由を」連絡会編, 徹底批判『国民の歴史』, 頁295-307。東京: 大月書店。
- 鶴見俊輔(2001[1956])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1931~1945年。東京: 岩波書店。
- 中村政則編(1994)占領と戦後改革。東京: 吉川弘文館。
- 濤川栄太(1997)戦後歴史教育の大罪。見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編, 新しい日本の歴史が始まる, 頁180-193。東京: 幻冬舎。
- 西尾幹二(1997)八月十五日以前の日本人、以後の日本人。見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編, 新しい日本の歴史が始まる, 頁12-23。東京: 幻冬舎。
- (1999)国民の歴史。東京: 扶桑社。
- 東アジア文史哲ネットワーク(東亞文史哲網絡)(2001)小林よしのり「台湾論」を超えて。東京: 作品社。
- 藤岡信勝、自由主義史観研究会(1996)教科書が教えない歴史。東京: 産経新聞ニュースサービス。
- 部落問題研究所編(1997)「自由主義史観」の本質: 虚像の日本歴史。京都: 部落問題研究所。
- 松本健一(1995)右翼: ナショナリズム伝説。東京: 河出書房新社。
- 丸山眞男(1998)忠誠と反逆: 転形期日本の精神的位相。東京: 筑摩書房。
- 水谷尚子(2005)「反日」解剖: 歪んだ中国の「愛国」。東京: 文芸春秋。
- 宮台眞司(1999)「情の論理」を捨て、「眞の論理」を構築せよ。見宮台眞司等, 戦争論妄想論, 頁11-56。東京: 教育史料出版会。
- 宮台眞司、姜尚中、水木しげる、中西新太郎、若桑みどり、石坂啓、沢田竜夫、梅野正信(1999)戦争論妄想論。東京: 教育史料出版会。
- 山野車輪(2005)マンガ嫌韓流。東京: 晋遊舎。

- (2008)マンガ嫌中国流。東京：晋遊舎。
- 山室信一(2007)憲法 9 条の思想水脈。東京：朝日新聞社。
- 吉見俊哉(2007)親米と反米戦後日本の政治的無意識。東京：岩波書店。
- 吉本隆明、田近伸和(1999)私の「戦争論」。東京：文化社。

## 英文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1998) The Goodness of Nations. Pp. 360-368 i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erso.
-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s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 Noam (2005) *At War with Asia*. Edinburgh: AK Press.
- Doak, Kevin M. (2007)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 Placing the People*. Boston: Brill.
- Dower, John W. (1999)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Duara, Prasenjit (2008)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Constitution of Nations: The View from East As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 323-345.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rootunian, Harry (2004)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Paradigm Lost, and Regained*.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 Hein, Laura, and Mark Selden, eds. (1996) *Living with the Bomb: American and Japanese Cultural Conflicts in the Nuclear Age*. Armonk, NY: M.E. Sharpe.
- Hein, Laura, and Mark Selden (2000) The Lesson of War, Global Power, and Social Change. Pp. 3-50 in *Censoring History*, edited by Laura Hein and Mark Selden. Armonk, NY: M.E. Sharpe.
- Hobsbawm, Eric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ida, Yumiko (2002) *Rethinking Identity in Modern Japan: Nationalism as Aesthe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Jepperson, Ronald L. (199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Pp. 143-63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ited by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2000)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London: Little, Brown Company.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44-181.
- Nietzsche, Friedrich (1969)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Orr, James J. (2001) *The Victim as Hero: Ideologies of Pe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war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cheler, Max (1973)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A New Attempt toward the Foundation of an Ethical Personalism*.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Ressentiment*. Milwaukee, WI: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 Seraphim, Franziska (2006) *War Memory and Social Politics in Japan, 1945-200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Wang, Horng-luen (2004) Mind the Gap: On Post-National Idea(l)s and the Nationalist Reality. Pp. 24-36 in *Globalization: Critical Issues*, vol. 2, edited by Allen Chun.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Weber, Max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